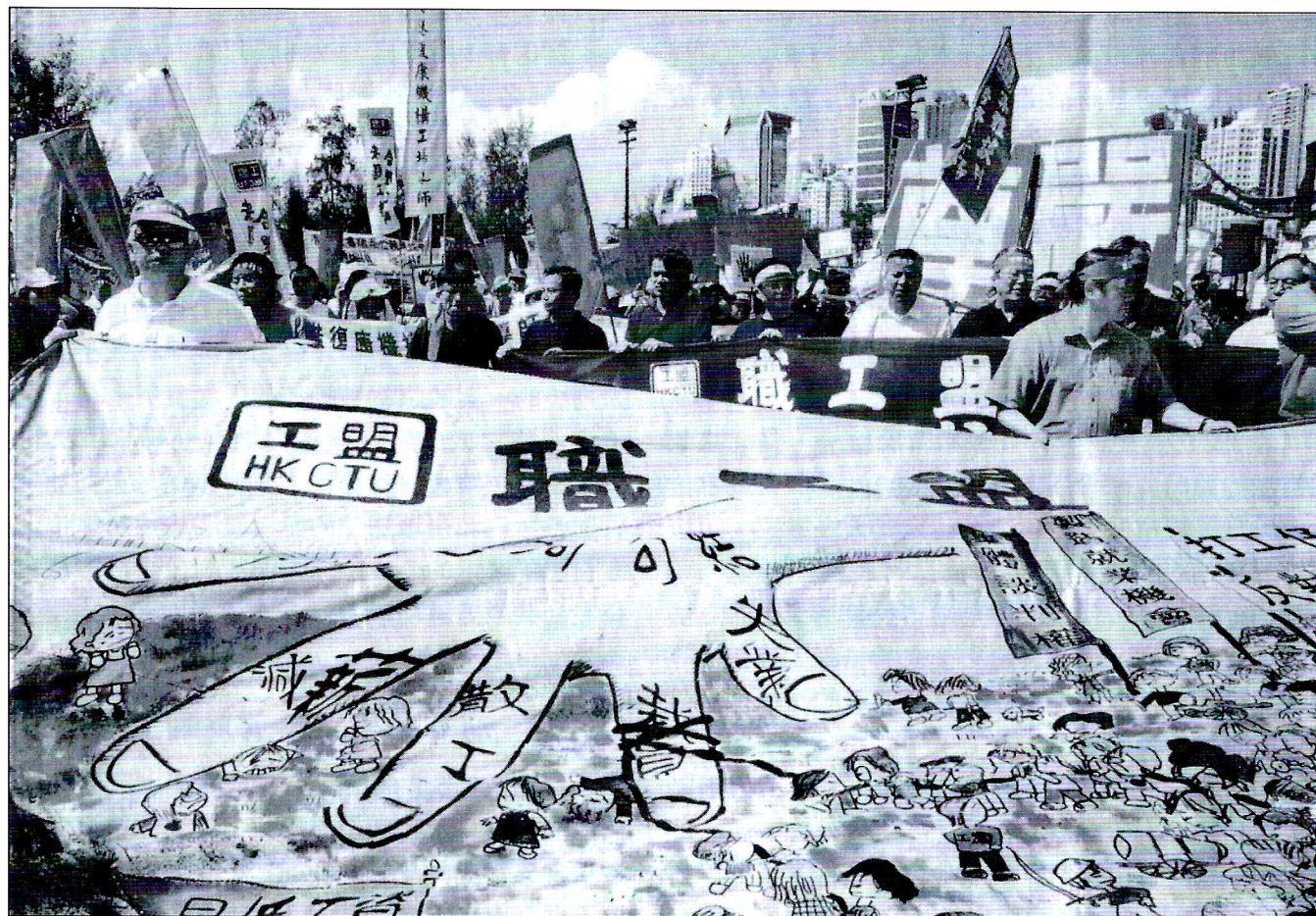


施政無力

民不聊生失業勁



高官問責制為誰設？ 失業形勢嚴峻

「六四」十三週年特輯 大慶工潮綜述

中東危機剖析 巴塞羅那抗議示威記述

義大利全國總罷工 法國政局兩極化

工農以鬥爭迎接「六四」十三週年

香港回歸五年 政府錯失頻生

振言

香港回歸中國即將滿5週年。在特區政府治理下，香港在各主要方面到底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呢？

一般地說，解除了英帝的殖民統治，這無疑是一種歷史性的進步，香港人民再也不受到英帝的政治壓迫、欺侮了。但是，全體港人民自治港、真正高度自治這個北京官方的承諾卻至今未有兌現，實現的只是執行京官政策的官商治港。「一國兩制」這個方針縱能基本上暫時保持，卻仍有走向內地一制化的表現，不但民主的社會主義精神也沒出現，而且資本主義勢力和剝削搾取程度則在香港有增無減。

人權法治情況不斷倒退

在人權和法治方面，5年來沒有進步，反而日益倒退了。其表現很多，舉凡大者包括有：

1、成立強姦民意的立法和政府機構，從北京欽點指派的臨時立法會，到後來的800人選舉委員會，預先保證了親京保皇派獲得了穩定的大多數票，可按照京、港官方意旨通過各種法律、條例、決定，和「選」出特首等，代替了由全港市民普選產生的立法機關和行政長官，從而製造出後來的侵犯人權法治等倒行逆施，毫不掩飾地把立法會及通過的法律條例變成京、港統治者的御用工具；

2、由臨時立法會通過《公安條例》，大大限制甚至剝奪了港人所應有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自由權利；無理地規定遊行、集會等須於7日前通知警方，得到書面批准才能舉行，否則便是違反公安條例，要加以拘控；

3、剝奪所有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在港居住、與家人團聚的合法權利；雖經香港終審法院根據白紙黑字的《基本法》條文規定，而裁定這類子女毋須內地審批即可享有這種居港權，但港府仍危言聳聽地極度誇大將有「167萬人湧來香港」為「理據」，於99年6月26日提請人大釋法推翻終院的上述裁決，憑著官僚意旨，任意踐踏法律所已賦予的這類內地兒童的權利，和香港終審法院的合法權力。嗣後，當局更殘酷無情地不肯運用酌情權准予他們留港而強行遣回內地。這是嚴重破壞人權和法治的典型事例；

4、香港警方曾多次以「破壞公共秩序」、「違反《公安條例》」等無理藉口，先後拘控遊行、集會人士。例如，98年9月21日，拘控5名反對世銀、國基會的遊行人士；2000年8月中，以違反《公安條例》非法遊行集會罪名拘捕10多名人士和5名學聯成員；2001年3月27日，裁判署判處古思堯、吳恭劭、梁國雄3名「街頭戰士」「藐視立法會罪」入獄7日，只因他們在立法會旁聽席上發表了意見；今年5月9日，警方更非常高姿態地清晨到梁國雄及學聯負責人馮家強、盧偉明家中拘捕他們，並以3個多月前參加「非法集會罪」起訴，定於今年9月審訊。以上的例子，都是當局以政治角度來考慮，從幾百宗未事先申請而舉行的遊行集會中、針對一些目標人士而揀擇出來拘控的。對於這樣被拘控的人，實質上是一種政治迫害，使之成為特區效法內地官僚統治手法的受害者。此外，警權日益膨脹，典型事例是在拘捕爭居權人士時，把和平地採訪的記者雙手也鎖起來帶走，此事引起了普遍的公憤；另方面，對於合法的法輪功學員在公共地方練功或遊行集會等，則時有加以為難、干擾。

劫貧濟富 偏幫財團企業

特區政府5年來盡力保護工商資本家的利益，為他們能在港多賺利潤想方設法，在泡沫經濟爆破後，當局曾先後動用約2千億公帑救市；新任財政司長梁錦松更鼓勵各企業「瘦身」裁員減薪，促成了1年內失業人數再增10萬人，而高達25萬以上，失業率升至7.4%，使5年來失業人數增加了兩倍，而工資則在1年內下跌1成多。對於這些弱勢社群，當局又拒絕民間要求設立失業援助金和規定最低工資及工時上限等主張。這些都造成有150萬人（約佔全港人口4分之1）生活在貧窮線下（每戶人均每月開支少於3750港元）。但高官還聲稱計劃要把綜援金額削減，並從明年起逐年減少醫療衛生、社會服務、公共房屋、教育等的財政開支。

對於低中層公務員，新任財政司在他的第一份財政預算案中，不等到私人薪酬調查結果，便提出要一

刀切地全部減薪4.75%，幅度比後來公佈的上述調查結果高出近兩倍，迫得他只好相應地大大減低原來的建議幅度。而且，這樣的減薪並無法律根據，於是又要立法會特別立法減薪，連公務員團體忍讓地提出雙方協商或成立仲裁委員會裁決等意見，都完全拒絕。港府這樣的強蠻無理、一意孤行，更加激起廣大公務員的憤懣，許多工會要再舉行抗議遊行。當局這次如果得逞，不但對幾十萬公務員和資助機構員工實行減薪以至裁員，而且推動私營機構再次效法這樣做，將成為回歸5週年官商勾結給予全港勞動市民的一個重大打擊！

教育改革 完全失敗

在具體的施政政策措施方面，5年來不但「乏善可陳」，而且錯失嚴重，笑話連篇。

試舉教育改革為例。高官們為了向北京作交代、獻忠誠，醜表功，在回歸開始便急急強制推行母語教學，發出強制性指引，命令部份以英語授課的英文中學改為中文中學，用粵語授課，企圖純粹用強迫命令的行政手段，去提高中文中學的聲望、地位，而完全無視香港一般的學生（和家長一樣）都希望能夠進入英中，重視提高自己的英語水平，而當時的社會風氣也視母語學校是次一等的學校。因此，強迫把英中轉為中中，客觀上便是把原為一等的學校降為次等，使得成績優良的學生要轉讀其他學校。這是極之愚蠢的主觀主義做法，因而受到普遍的反對，陷於完全的失敗。

另一項激發起教師非常強烈抗爭的措施，是推行教師基準試（後改稱語文能力評核試）。這項措施被視為全部語文教師都要「再考牌」，是對他們語文能力及尊嚴的侮辱，因而遭到教師們的反對、罷考、抗議遊行。結果，港府對現職教師作出讓步，1萬5千名英文教師有5年時間達標，持英文學位及受英文師訓的教師可獲豁免，而只對新入職教師進行基準試。教協發起和領導的這次抗爭贏得了重大的勝利。

特首辦高級特別助理路祥安與前港大校長鄭耀宗會晤後，後者指使副校長黃紹倫向鍾庭耀施壓，要他停止作民意調查。此事經過調查屬實，證明特首辦確曾干預學術自由、阻止民意調查，掀起了一場「民調」大風波，揭破了起碼是特首辦的卑鄙行為，在這件事上，特首是不能推說毫不知情而辭其咎的。

肥了地產商 苦了小業主

回歸後，令人矚目的問題是樓價大跌、且跌勢一直不止，將近5年內跌了近6成，在這期間購入的物業都貶了值，尤其是高價購入的，變成了「負資產」。據金管局數字，至今有67500宗負資產個案。負上此債的人大多數為中產階層，也有低下階層市民，他們原本希望不再是無殼蝸牛的，豈料反而背上更沉重的負荷。其中原因，主要是由於回歸前後兩朝當局推行高地價高樓價政策，幫助大地產集團遠超所值地推高樓價，然後不斷下跌，從而使後者大獲暴利，許多大地產商頓成巨富。就特區政府的責任來說，董建華97年7月在其謀士地產測量師梁振英的協助下宣佈「八萬五」政策，定出10年內達至7成自置居所比例的目標；後來，一些高官公開鼓勵市民購置物業，激起了97年下半年的物業成交數接近9萬宗，較少於98、99年的全年數字。但98年6月樓價開始大跌，董建華直到2000年7月才宣佈「八萬五」政策早於98年已不存在（即，在宣佈這政策一年之後，便在地產商等的壓力下承認它已破產）。同期間內，「居者有其屋」（簡稱居屋）也不時宣佈減建、停售、減售（從3年內年售2萬伙以下，再減至年售不超過2千伙），以此向地產集團再作讓步，大派定心丸。

另一方面，港府將房屋架構大肆重組，宣佈從7月1日起，由一名問責制局長統領全港房屋政策事宜。房屋局和房署將合併成新的房屋機構，而房委會職能全面削減至只充當諮詢角色，房屋協會日後更只能與市建局共同進行重建工作。

這就是要將房屋委員會建屋的職權削減至只作諮詢之用，原有可以反映公眾意見的社會各界人士參與的委員會將只變成橡皮圖章，不能再起協商作用，而房協也不再建公屋，房屋決策權全歸局長一人獨攬，他則只對特首一人負責。這樣的重組，將有利於地產商對樓宇供應的操縱，重新抬起樓價。

誰應負主責？

以上所述的，是鐵一般的事實和表現，廣大港人都能看到、知道的。對於過去5年這樣地倒退、施政諸多錯失應負責任，尤其是主要責任的特首和高層官員，本來早就應該自動辭職，或者被撤換了；但香港特區政府也跟隨內地具有的這種中國特色運轉，官位不受本人無能、政績低劣等所影響。第一任特首即將任滿時，即使多份民調反映出他的聲望日低，跌破合格率很多，仍可以不必宣佈新的施政綱領便自動當選

連任。這是預先設下的小圈子「選舉」機制代替了全港民主普選產生特首的必然結果。

港澳辦主任錢其琛在6月24日接受香港無線電視的訪問時，以「人非聖賢，誰能無過」來評價董建華過去5年的工作（這也就是認為董5年來有過錯）；並解釋說，香港在回歸後，除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一人外，所有公務員也留任，董建華「可說是『孤家一人』作戰」；相信在推行問責制後，董建華在政府內便不再是「孤家一人」，施政可望改善（見翌日如實報道的許多份港報）。這樣地企圖把5年來施政失誤的主要（甚至全部）責任推在港英時代留下的公務員

與特首不協調合作上面，可有多少港人信服接受呢？推行問責制後，極大部份原有公務員仍然留任，而只加入幾個新官，這樣便可根本扭轉局面，改善施政，不是太天真的純主觀願望，有什麼像錢其琛所要求於港人的「客觀公正」可言呢？！

因此，多份民調都顯示，回歸以來，民怨民憤日益增長，市民對董建華及其領導下的政府不滿意的大為增加，對香港前景的信心感到悲觀的人增加了幾倍，這是人民眼睛雪亮的又一次證明和結果。

2002年6月25日

高官問責制為誰設？

微波

董建華為了加強其領導班子能力、挽救其日益下跌的民望，急急忙忙推出高官問責制。儘管官方宣稱這是香港歷史上最重要的政制改革，立法會議員不夠時間去翻閱、研究政府所提交的資料，儘管這樣重要的機制改建沒有普遍徵詢全港市民的意見，立法會的蓋章機器還是如命地依時完工，使得新班子能趕在7月1日國家主席來港為特首及這班高官加冠。

這批由董建華挑揀任命而組成的權力班子，只對他一人負責，而不必對全港市民和立法局負責，市民和立法局也不能制衡它。它吸納了立法會兩大黨（民建聯和自由黨）的黨魁及工聯會領袖擔任行政會議成員及局長，使得他們在立法會內更馴順地支持特首及其提出的政策和法案（特別是京官催促制定的基本法第23條立法），與那些跟隨北京的議員構成了立法會的穩定多數票，其他的不同意見議員無法加以制衡。這就把行政、立法等大權集中於特首一人手裡，形成更不開放、更不開明、更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政府將來的施政錯誤過失所造成的不良後果及損失（有如回歸5年內所造成的），都要由香港市民承擔。

民建聯（加上它所領導的工聯會力量）早已不諱言它要發展成為香港特區的執政黨，這也是中共和北京中央政府的願望，以便更忠誠地執行它們的意旨和

政策。今天這兩個領袖的入閣，就是具體達成這個願望的第一步。不過，它們至今的發展是得助於以爭取基層利益作為標榜，而它擁有非常豐裕的物質資源也使它能夠多做些基層福利的工作，因而較多地吸收到會員。在入閣後，如果它與政府及上層社會親密合作得太露骨，日益背離低下層市民的利益，則後者勢將會拋棄它，以至反對它。德國綠黨的政壇起落就是一個新例子：它在98年大選中取得47個議席，與社民黨組成聯合政府，但卻不能影響其環保等政策，反而要為政府的施政失誤負上責任，因而引起其支持者不滿，所得支持票大跌。據《明報》報道，對於鄭耀棠接受加入行會的邀請，工聯會內部「存有意見」。這表示它內部是有不同的、甚至反對的意見的。入閣後的邏輯發展將可能會擴大它內部的歧見，加闊它與其支持者及市民之間的距離，因為他們的眼睛是雪亮的，能夠分辨是非曲直，就好像上述德國人民對綠黨的看法一樣。

高官問責制的主要官員，必須由全港選民民主選出；而且，決不應該是對特首負責，而必須是對全港市民負責的。特首本人特別必須這樣。反對把行政、立法等大權集中於他一人手中！

2002年6月23日

工農以鬥爭迎接「六四」十三週年

社論

在八九民主運動被血腥鎮壓以後，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和民生權益、反對官僚專橫及貪污腐敗的鬥爭，仍然在艱苦不屈、時起時伏地堅持著。特別是今年3月以來，從東到西、從南到北，許多地方都湧起了工人的罷工遊行示威（有些更高達幾萬、持續多時），廣大群眾上訪請願抗議，以及農民集體街頭示威、抗議稅負沉重、官員貪污，等等：

而富有意義的是，大慶和遼陽等地工人吸取了八九民運工人組織獨立於官方工會的自治聯合會的經驗，繼承了後者的鬥爭傳統，今天在抗爭中也成立了「臨時工會委員會」等名稱的組織，領導鬥爭，各廠職工選出代表互相連繫，要求人大批准人權公約中「組織獨立工會」的條款，等等，具有承先啓後的意義。

工農大眾之奮起抗爭，完全是由於中共的官僚專制政權和錯誤政策措施所造成的。它剝奪了人民的言論、出版等自由，和選舉、罷免公職人員的民主權利，以致各級官僚得以貪污腐敗、專橫獨斷，實施損害工農市民權益的政策，使廣大人民生活困苦，怨聲載道。例如，它廿多年來實行全面走資本主義道路，為追逐利潤，以工人為犧牲品，大力裁員減薪，以致工人下崗失業的越來越多，許多工人的欠薪和遣散費等又久拖未付，使他們全家生活更加陷於困境，淪為赤貧者。這是近來大慶油田、遼陽市等地工人不斷起來抗爭，以爭取應得利益和復工權的直接原因。這許多風起雲湧的群眾鬥爭，清楚顯現出中共所造成的社會矛盾的尖銳化、中共政治經濟危機的加劇；也再次證明十三年前八九民運反對中共官僚及其特權，實是客觀的迫切需要。

八九民運另一個鬥爭目標是清除官僚貪污腐敗。而六四鎮壓使這個目標未能達成，以致十三年來，中共的貪污腐敗情況越來越普遍而嚴重。最近，中國社會上揭破中共口頭上反腐敗的「普遍說法是：腐敗越反越大，越反越多、越反越嚴重」。這又證明八九民運反貪污腐敗鬥爭目標的正確，是社會進步發展所必需，而中共的鎮壓則是極端反動的。

但祇要上述的中國人民需要（亦即八九民運所要爭取的任務）一日未能達成，則人民的抗爭仍會不斷地持續。特別是，由於中共向國內外資本主義勢力大肆讓步，極力討好，尤其是在入世之後，使工人、農

民利益備受損害，更多國企倒閉或裁員，失業工人日益劇增；農民的農副產品敵不過外國湧入的廉價貨，被迫賤賣求售，收入更為減少，貧困戶增加，由此造成社會日益分化，貧富日益懸殊，民間怨憤日益深重，這些在不久將來勢會引發大規模的民眾抗爭。

在八九民運期間，全港市民熱情支援大陸的民運，約佔全港人口兩成的市民曾上街參加百萬人大遊行，以後每年的六四期間，港人都舉行遊行、集會，在香港回歸後，香港便成為北京中央政府統治的全國領土內唯一能夠公開舉行紀念六四的地方。香港特區政府為要收緊港人的遊行集會等自由，最近高姿態拘捕四五行動成員梁國雄、專上學聯負責人馮家強、盧偉明3人，控以3個多月前未經申請而舉行遊行、違反《公安條例》罪，便是這種政治性意圖的其中一項表現。另一項剝奪港人遊行集會自由的新措施，就是把政府總部外的空地劃為請願及公眾集會的禁區，以圖取消市民和支聯會慣常在該處集會、請願的權利。但在支聯會的反對和上訴後，上訴委員會推翻了當局此項決定，批准支聯會可以繼續在該處舉行六四集會，而其他市民的集會、請願也將會同樣有此權利。這是支聯會和港人的一次勝利，打擊了當局意圖限制自由集會的無理決定，激勵了港人以至中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意志。

在紀念六四屠殺十三週年的今天，我們必需再接再厲地發揚八九民運戰士的英勇鬥爭精神，配合大陸工農群眾此起彼伏的鬥爭，為爭取實現以下的目標而努力：

- 平反六四，恢復被污衊了的民運及其戰士的名譽，釋放所有繫獄的民運戰士和不同政見者，賠償當時遇難者和受害者的損失，清算進行鎮壓的領導人的罪責；
- 實行徹底的政治民主改革，廢除極權的一黨獨裁，取消官僚的政治、經濟特權，發揮人民力量去肅清貪污腐敗，全體人民充分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罷工等自由權利；
- 反對資本主義在中國大陸復辟，反對犧牲工農大眾利益的「入世」政策；
- 實現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使人人自由、平等，各盡所能地充分就業；揭破中共的假社會主義。

2002年6月1日

(轉載) 114位難屬致人大、政協的公開信

(2002年2月27日)

〔中國人權受「六四」難屬群體114人委託，向國內外媒體和輿論界公佈他們簽署的公開信，這封由丁子霖等114位「六四」死難者家屬和傷殘者簽署的公開信，是寫給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和全國人大會議，難屬群體向中國最高檢察院投訴，要求立案偵察「六四」血案，追究前總理李鵬對此血案的罪責，起始於1999年5月。公開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

1989年的「六四」大屠殺已臨近第十三個年頭了，我們相信諸位一定還記得在那場大屠殺中被無辜剝奪了生命權利的人，因為他們有些是你們熟悉的鄰居或同事，有些是與你們休戚相關的學生或親友，有些你們也許並不認識，但他們是和你們生息於同一片土地的同胞骨肉。

今天，給諸位寫這封信的，正是那些在十三年前被無辜剝奪了生命權利的人們的親屬——他們的父親和母親，他們的妻子和兒女，他們的兄弟姐妹，以及在那場殺戮中致傷、致殘的幸存者。

我們給諸位寫這封信的目的很單純，就是要為我們死去的親人及其他受難者尋求法律的公正。

在三年前，也就是1999年的5月，我們曾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向最高人民檢察院遞交了請求立案偵查「六四」事件中刑事犯罪、追究原國務院總理李鵬法律責任的控告書。在過去的兩年裡，我們曾兩次致函最高人民檢察院，要求對我們的控告作出答覆。現在已是第三個年頭了，但我們仍然沒有得到最高人民檢察院當局的任何答覆。在一個已經把「依法治國」寫進憲法的國家裡，這種情況難道是正常的嗎？

在這裡，我們要請問諸位：當你們一年一度身負重託步入莊嚴肅穆的議事大廳時，你們是否意識到這樁已經積壓了十三年的冤案需要有個了結？當你們與那個應對十三年前那場殺戮負有刑責的人坐到一起的時候，你們是否意識到他應該坐到共和國法庭的被告席上？我們相信，諸位作為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如

果無愧於真正的民意代表，如果無愧於真正的良知之士，這個問題應該不難回答。

基於這樣的信任，我們今天以「六四」受難者和受難親屬的名義，鄭重向諸位提出如下請求：請你們按憲法賦予的權力，切實履行對各級政府部門實行監督的職責，責成最高人民檢察院盡快對我們的控告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答覆。

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檢察機關應當對公民遞交的控告材料迅速進行審查，認為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應當立案，認為沒有犯罪事實或犯罪事實顯著輕微的，不予立案，但必須把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

我們認為，憲法和法律是神聖的，公民有權利也有義務控告任何犯罪嫌疑人，司法機關應切實保障公民的此項權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包括國家和政府領導人如果觸犯了刑律，都不應免受指控及法律追究。

今天，由於來自各個方面的大量人證、物證、書證的公諸於世，十三年前那場大屠殺的真相已大白於天下，那些對大屠殺負有刑責的人也已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這進一步證明了我們在三年前向最高人民檢察院遞交的控告書在法律上具有無可辯駁的真實性和正當性；同時也說明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我們的控告採取置若罔聞的態度是違背現行法律的。這裡，我們有必要重申三年前我們對前國務院總理李鵬所提出的控告。我們還要在這裡重申：我們不會放棄此項控告，直至把犯罪嫌疑人李鵬送交法庭接受公正的審判。

十三年前的「六四」大屠殺，是中國百年來和平時期發生的最殘忍的暴行，也是20世紀和平時期在世界範圍內發生的最慘絕人寰的殺戮之一，這場大屠殺作為歷史的一頁，並沒有在今天的現實中終結；它作為一個時代的惡夢，仍然沉重地壓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身上；祇要「六四」問題一天得不到公正的解決，歷史的傷口就難以彌合，中國也不可能從黑暗走向光明，躋身於現代文明國家的行列。

最後，我們再一次真誠地呼籲出席本屆大會的各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不負重託、不辱使命，切實地推動和監督「六四」事件的公正解決。

簽署者：

丁子霖 張先玲 周淑莊 李雪文 徐 珏 郭麗英
尤維潔 尹 敏 高 婕 杜東旭 宋秀玲 于 清
蔣培坤 王範地 袁可志 段宏炳 趙廷杰 錢普泰
吳定富 孫承康 鄭滌清 黃金平 賀田鳳 孟淑英
袁淑敏 劉梅花 謝京花 周淑珍 馬雪琴 鄭瑞榮
張艷秋 張樹森 楊大榕 劉秀臣 沈桂芳 謝京榮
孫 寧 王國先 王文華 金貞玉 孟金秀 要福榮
孫秀芝 孟淑珍 田淑玲 寇玉生 王桂榮 譚漢鳳

孫恒堯 周 燕 李桂英 徐寶艷 劉春林 狄孟奇
楊銀山 管衛東 索秀女 劉淑琴 王培靖 王雙蘭
張振霞 祝枝弟 劉天媛 潘木治 黃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張耀祖 包玉田 軋偉林 郝義傳 蕭昌宜
任金寶 林景培 田維炎 楊志玉 齊國香 李顯遠
張彩鳳 王玉芹 韓淑香 曹長仙 方 政 齊志勇
馮友祥 何興才 劉仁安 李淑娟 熊 輝 韓國剛
石 峰 周治剛 龐梅清 黃 寧 王伯冬 張志強
趙金鎖 孔維真 劉保東 陸玉寶 陸馬生 齊志英
方桂珍 蕭書蘭 葛桂榮 鄭秀村 王惠蓉 刑承禮
桂德蘭 王運啓 黃雪芬 王 琳 劉 乾 朱鏡蓉
(114人)

(轉載) 中國200多名民運人士呼籲

民主法治、社會公正，釋放政治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

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

我國已經進入新世紀第三個春天。過去的一年，中國加入世貿，北京申奧成功，足球走向世界。國民經濟保持了較高的增長幅度。令人遺憾和不滿的是：我國的人權和法制狀況難以適應進入世貿、籌辦奧運和市場經濟規範化的需要。一年來，為爭取民主和法治而被捕和被判刑的公民，北京有楊子立、靳海科、徐偉等5人；四川有黃崎、胡明君等3人；山東有牟傳珩、燕鵬、王金波等3人；甘肅有李大偉。

前些年為爭取民主和法治而被判刑的有胡石根、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方覺、張善光、岳天祥、劉賢斌、余萬寶、佟適冬、廖石華、柏小毛、高洪明、查建國、王澤臣、王文江，祝正明、吳義龍、毛鳳翔、朱虞夫、徐銘、安均、劉世遵、高勤榮、單稱峰、範子良、王萬星等尚在監獄、勞教場所或精神病院。陳子明保外就醫被嚴密監視。

我們為有如此眾多忠於理想、堅持信念、頑強不

屈、不畏強暴的民主派同仁而驕傲。

我國在政治性和非政治性案件中，都有濫用「留置」、「拘傳」，逾時傳訊、傳喚，無限期拘押、枉法判罪、枉法殺人、虐待人犯等違反國法公正和國際公法的行為。為了保障人權、推行法治現代化，我們要求政府、人大和執法部門在近期採取以下措施：

一、檢查並切實改善政治犯的生活、醫療獄政待遇。分批釋放全國各地的民運政治犯及其他思想言論犯。

二、在即將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上批准1998年10月6日我國政府簽署的《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並以修改國內的法律法令，切實保障人民的合法權利不受非法剝奪。

三、在全國人大建立專門機構，統一指導和監督司法改革，維護獨立審判和司法公正，堅持糾正一切違反實體法和程序法的執法犯罪行為。

四、在中國本土，建立中美和中西方聯合人權監

督機構，實施國際監督。

此致敬禮

2002年2月18日

中國公民：

（陝西）林牧、吳震、張宗愛、馬俊、趙常青、林小平、高凱、魏光君、程小寶、師濤、顏均、路中明、

（北京）任曉町、何德普、金成、周國強、徐永海、王天成、陳青林、王建軍、張存珠、馬文都、劉靜、高峰、趙昕、錢玉民、蔣福建、於林峻、劉建新、楊靖、朱銳、沙裕光、王志新、高玉祥、王林海、馬強、侯杰、韓罡、王美茹、孫立勇、王軍鷹、金艷明、章紅、劉風剛、馬少華、劉煥文、王沿海、張鳳穎、胡默、陳青林、孫亦榮、欽歡、孫贍、王林鍵、路坤、張國華

（貴州）廖雙元、莫建剛、李家華、方家華、金林志、熊晉仁、韋登忠、吳若海、杜應國、蘆永強、黃燕明、孫光金、徐國慶、張重髮、吳郁、薛德云、陶玉平、孫庭華、陳德富、季風、杜和平、徐應元、賈三友、趙金鵬

（東北）蕭利君、冷萬寶、唐元嶺、賈偉、孔佑平、龐梅青、劉紹坤、梁立維、姜勝漢、李杰、遲壽柱、楊福文、全力、姜利君、王德豐、田曉明、劉俊吵、何震春、張素芝、楊世勇、李維、寧先華、楊亮、

（上海）韓立法、金濟生、齊紀成、姚振賢、姚振義、楊勤民、朱國華、徐虹、姚天生、談志華、徐紀

成、楊宏偉、顧國平、王勇剛、應晚成

（四川）歐陽懿、張明、廖亦武、陳衛、陳明先、蒲勇、周志剛、鄧永亮、魯登川、吳嗣寧、朱易平、曾富洪、馮鍵、張德貴、何時茶、張寶龍

（重慶）鄧煥武、李運生、何兵、閻家、王明、鄧代坤、梁俊西

（浙江）陳龍德、王東海、毛國良、吳高興、葉文相、趙萬敏、傅權、金秀元、鄧達祥、呂耿松、陳凡

（湖南）張帆、毛金祥、陳國金、蔣複興、宋戈、胡曙光、李金鴻、唐基石、譚力、胡卓毅、廖國強、梁愛城、廖晚行、侯水竹、何橫華、謝長髮、金繼武、

（山東）姜福禎、張銘山、申貴軍、車宏年、於敖之、牛天民、劉玉賓、

（河南）王冰、薛紅、安壽榮、安易榮、安永榮、安陸榮

（福建）張寶欽、陳延齡、陳健、王振軍、陳一兵、陳鼎明、

（江蘇）郭少坤、樊百華、王瑟

（廣西）王治晶、李小龍、薛正標

（廣東）劉抗修、楊天水

（湖北）劉飛躍、李衛平

（安徽）馬良綱、沈良慶

（甘肅）王鳳山、郭新民

（山西）李慶喜

（寧夏）陳曉

（轉載） 紀念"六·四"，理性前進

——聯名紀念"六·四"十三周年

中國大陸五省市人權民運界人士

極權的背後是極端的利益。

極端利益需要極端的暴力和極端的愚昧來維持。

對於極權者而言，恐懼和遺忘是他們最後的工具。

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大陸的和平民主愛國運

動，是國民對中國歷史上最腐敗最頑固的極權勢力的不屈服抗爭。

這場運動的正義性和民意性，與執政當局的頑固、殘暴已經同載史冊。

是的，這場正義的、具有廣泛民意基礎的和平民

主運動被武裝到牙的惡劣勢力鎮壓了。鮮血流淌天安門、流淌長安街……坦克碾過肉身，活著的人被追捕，被囚禁，被流亡……恐怖成爲一種事實，在國民眼裏心裏，在其他國家人民的眼裏心裏，在恐怖製造者的眼裏心裏。然後是遺忘與拒絕遺忘之間的對峙。

有良知的學者或作家要出版自己的書籍，拒絕遺忘，印刷數的末尾兩位數是"64"，比如，"2064"冊或者"10064"冊；一般捲入這場運動的人們拒絕遺忘，安裝電話、買手機、買傳呼機、申請電子郵件信箱或註冊QQ號，總要選一個有"89"或"64"的數字號碼。爲這場運動的受難者進行人道幫助的人們不會遺忘，遇上捐助，總要在整數以外，顯示"64"或"89"的數字。有膽敢維護民眾權利、反對腐敗的人，被當權者指認爲"89"或"6·4"動亂份子"……這種事件與丁子霖、張先玲老母親們的眼淚一樣真實。

沒有忘記，不忘記！

13年來，每年4月底就預先佈置嚴防嚴打；13年來，逢重大節假日就繃緊神經；13年來，逢國際友人來訪就將異議人士隔離起來；13年來，逢"兩會"召開就擔心人提出"平反"、"政治改革"的議題；13年來，挖空心思進行言論、出版、結社自由的扼殺；13年來，拼命阻擋把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內容寫進憲法；13年來，高舉"穩定壓倒一切"的戰刀……

遺忘了嗎？製造恐懼、幻想得到遺忘美好局面的人是你們自己！

恐懼還在！因爲恐懼的根源沒有消除。

恐懼還在！遺忘與拒絕遺忘之間的對峙就不會自行蒸發！

恐懼還在，虛假的穩定也維持著，經濟增長的速度在數字虛空中高挂，我們的民族、我們的民眾得到的和失去的是什麼？是國企在穩定地、有計劃、有步驟地被瓜分和企業員工權益的被肆意剝奪，是道德的淪喪和民族心靈中的正義與良知的泯滅，是不同利益群體的心理裂痕的人爲撕裂埋下仇視的種子難以消弭……

我們的民族和人民需要和諧，需要未來；正義和良知需要得到扶持。正因爲此，堅持正義、良知、堅持"公開、理性、非暴力和多元互動"的人們，無所畏懼地聚集在一起，面對世界上最頑固、最殘暴的極權

勢力的監禁、流放，發出"人權"、"民主"、"寬容"、"多元"的響亮聲音，連綿不絕。

我們的要求不多，重新評價"6·4"，爲死難者平反昭雪，給死難者家屬安慰，釋放一切良心犯，預備政治、經濟革新，推動憲政民主，實現主權在民，完善社會保障。我們的要求不高，這是我們的權利。

13年來，我國大陸人權民運界同人前仆後繼，雖千萬艱險不放棄；13年來，我們不斷完善和發展我們的個體和團隊，目標一致；13年來，我們理性推進，贏得了國內各界和國際友人越來越多的認同和支持……

今年"6·4"忌日近了，陝西、四川、重慶、貴州和廣西五省市49位

人權民運人士聯名紀念"6·4"13周年，我們表示：

爲死難的同胞致哀！

爲天安門母親進言：媽媽，保重身體！

請在獄中的友人胡適根、徐文立、江祺生、劉賢斌、秦永敏、王有才、余萬寶、陳西、王澤臣……放心，我們會加倍努力，理性前進！

讓所有的人們知道，我們會走得更好，因爲我們在傾聽和實踐來自你們的智慧與理性！

五省市49人聯名名單：

陝西：吳震、馬駿、林牧、張宗愛、趙常青、林小平、高凱、魏克君、程小保、師濤、顏均、陸中明、傅升、吳雙印、李智英、馬曉明

四川：陳衛、廖亦武、歐陽懿、陳明先、蒲勇、周志剛、朱易平、曾福洪、鄧輝

重慶：鄧煥武、王明、李運生、熊志力、張傑、閻家鑫、何兵、許萬平

貴州：廖雙元、莫建剛、曾甯、孫光權、黃燕明、張重發、盧永祥、陳德富、李家華、方家華、杜應國、季風、陶玉平

廣西：李小龍、王治晶、薛振標

由於諸多不便，其他願意簽名的友人未聯繫上，在此請求原諒。

(2002年5月25日)

(轉載)

紀念三位遇難的大學生

——“六·四”十三周年祭

丁子霖

今年“6·4”周年，我謹以此文祭奠三位遇難的大學生。他們是：

- ◆北京農業大學園藝系碩士研究生戴金平
- ◆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雙學位生程仁興
- ◆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碩士研究生周德平

他們倒在了天安門廣場。

這三位中的兩位，戴金平和程仁興，都是被戒嚴部隊射殺於天安門廣場的。前者倒在毛澤東紀念堂附近，後者倒在天安門前的旗杆下。而在我找到他們之前，我一直無法肯定地回答天安門廣場有沒有死人這個被問了不知有多少遍的問題。

這不禁使我想起1996年的一件往事。那年12月，中國國防部長遲浩田去美國訪問，當他在美國國防大學講演結束時，曾有該所大學的學生就89年“6·4”屠殺學生和市民一事提出質詢。遲浩田竟在大庭廣眾之下以不負責任的外交謊言來回答人們對一件嚴肅政治事件的提問。他信誓旦旦地說：“我當時作為解放軍總參謀長，我在這裏可以負責的、認真的回答朋友們。天安門廣場上沒有死一個人，出問題就出在東西方向和南面方向，有一點問題，就是有點推推撞撞。”話說得竟是如此輕鬆！死了那麼多人，竟被說成僅僅是“有一點問題”！但是，我當時無法肯定廣場上究竟死人了沒有？我心裏想，政府堅持這樣的說法也許作過調查、掌握有確實的證據吧。由於沒有相反的證據，當時我只是就遲所說“就是有點推推撞撞”的謊言提出要同他當面對質。

現在，這件事快過去6年了。我已知道當時至少有兩名大學生死於天安門廣場，而且其中一名就死在“共和國”的旗杆下。但我反倒不想再同那位黨國大員作什麼對質了，因為他不配！

在中國，謊言成了堂而皇之的政府行為。政府大員們能把謊言撒到國際上去，他們在國內的作為也就可想而知了。但是，大員們的謊言對於國內的黎民百姓來說，就沒有象在彬彬有禮的外交場合那樣輕鬆

了，它是一種災難，一種可以把人們推向絕路、置於死地的災難。這裏，還是讓我們來聽一聽那些在層層謊言覆蓋下的無辜生靈的呻吟吧。

什麼叫生不如死？

我要為之祭奠的三位死難者，他們都是農家子弟，都來自湖北農村，都出生於多子女家庭，又都是全家唯一受高等教育者。他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多數務農。他們生前都肩負著改變全家貧困境遇的希冀和重托。但是，在13年前的那個黑色周末，這三個家庭幾乎在同一時刻墜入了苦難的深淵。從此，他們年邁的父母年復一年地守望在陰暗潮濕的家門口，期盼著兒子的魂魄能回到自己的身邊，更思想著自己能早日隨兒子去到那個不再有痛苦的世界。

那是1995年的冬天，在一個沒有陽光的日子裏，一位大半輩子與泥土打交道的誠實農民——程仁興——的父親，終於因貧病交加、不堪承受喪子之痛而離開了人世。臨終前，他用盡僅有的一點力氣呼喊着兒子的名字：“仁興仔啊！阿爸來陪你了……！”老人死後，程母經受不住接連的打擊，幾次想隨丈夫去找自己的兒子。有一次，她趁家人不備，懷裏揣著兒子的遺像，把一條繩索系在了自家的房梁上，決定隨兒子而去，幸而被年僅十歲的孫兒及時發現。孩子苦苦哀求，用自己稚嫩的肩膀支撐著奶奶的身軀，足足有一個多小時才被大人趕來救下。什麼叫生不如死？我想無須我再多說什麼了。

程仁興是我所在學校的學生。89年我兒子遇難後，我輾轉於病榻之上。我從前來看望我的學生和同事那裏得知，人民大學有7名大學生、研究生遇難，其中就有一位叫程仁興的（當時人們把他的名字誤為程紅興）。出於對同難者命運的關切，我曾托周圍的同事、朋友、學生瞭解死者及其親屬的情況。但由於死者檔案已在“6·4”後封存，也由於知情者囿於當局壓力不敢向我提供有關線索，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根本無法進一步瞭解死者及其親屬的情況（尤其是

死者親屬的下落），也就只好暫時放下。10多年來，我一直心存歉疚。我曾作過無數次努力，然而，尋找的線索總是在最後一刻斷絕了，留下的是揮之不去的懊喪和無奈。

大概是感動了上蒼的緣故吧，終於在去年年底的一天，一個偶然的機會又重新燃起了我已經失落多年的希望。那天我家裏來了一位素不相識的客人。他詢問起在我們已經掌握的死難者名單裏有沒有一個叫程仁興的？他說如果我們還沒有找到這位死者的家庭，他有可能向我們提供幫助。兩天後，也就是2002年的元旦，這位朋友果然給我送來了有關死者程仁興及其家屬的資料。一位與我們這個群體毫無關涉的朋友，又是在“6·4”事件過去這麼多年之後，竟還能如此同情和關心我們的群體，我還能用什麼樣的語言來表示對他的感謝呢！我想我首先該做的，就是即刻同程的家屬取得聯繫。

第二天，我就按這位朋友提供的地址給程的父親寫了一封信。當然，我並不知道程的父親已經在7年前去世了。我也不知道在過去的10多年裏由於地方上行政區劃的變動，原來的通信地址已不能再用了。但居然程的親屬收到了我的這封信。後來知道是當地同情程家遭遇的一些好心人幾易其手，最後才把信送到程家的。

從程家的回信中我得知，今年年初，風燭殘年的程母自摔了一跤後遂臥病不起，因無錢送醫院治療，只能在家裏承受煎熬。於是我立即給程家彙去了一筆救助款。13年了，這是這家難屬第一次得到來自海內、外朋友的關心和幫助。當我收到程家寄回的捐款收據並獲知老人已被送往醫院治療後，我連日來一直懸著的心才落到了實處——儘管，這並沒有減輕多少我內心的那份沈重。我想，要是能早一點同程家取得聯繫，也許這個家庭的景況會好一點，也許程的父親還不至於那樣匆匆地離開人世。

他也是一位清華學子

今年2月22日，來華訪問的布什總統去清華大學發表演講並回答學生的提問。那天，我確實如我的學生——女記者高瑜——在一篇文章裏所說的那樣，是流著眼淚聽完布什總統講演的。這倒不是因為總統的講演有什麼特別動人之處，而是我深感於中、美兩國制度之迥異。同樣是人，為什麼我們中國人就不能象美國人那樣享有本該屬於所有人的那份自由和權利

呢？為什麼人類歷史已進入21世紀的今天，還需要由一位外國總統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最高學府給那些一向被認為是中國最優秀的才俊們宣講人類的普世價值，而且所講的不過是一些最普通的常識呢？再看看講演大廳裏那一個個經過精心挑選的清華學子，他們那傲慢中摻雜著自卑、欣羨中摻雜著嫉妒的神態，我不能不想起當年他們的那位學長——清華無線電系碩士生周德平。我很想對那天有幸坐在講演大廳裏的青年朋友們說，當你們為清華出了那麼多黨政要員而感到榮光的時候，是否也應該記住，早在13年前，你們的那位學長就已經在以自己的行動為實現今天布什總統所宣講的一切進行奮鬥了，而且他已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我——一個曾經在大學課堂裏和講臺上度過大半輩子的人——就是在這百感交集的思緒中聽完布什總統講演的。我想到了89年的那場運動，想到了當年有那麼多青年男女倒在血泊中，想到了今天仍然有很多中國人經受著各種苦難。我——一個曾經在89年失去了兒子的母親——為我們的民族有周德平這樣的清華優秀學子而感到驕傲和安慰，也為今天出現在我眼前的那個場景而感到悲哀和失望。

說起清華，說起周德平，我的思緒不由得從濟濟一堂的講演大廳轉到湖北南部一個貧困的小村莊。那裏曾經是養育清華學子周德平的地方。他已經從這塊曾萌生童年夢想的土地上消失了。但他年逾7旬的父母仍生活在原來的地方。自兒子遇難後，那年年月月伴隨著兩位老人的，只是無盡的淒苦和絕望。

我是在6年前才尋找到周的親屬的。我自己無法去看望這兩位老人，一直到去年冬天，才委託一位朋友順道去看望了他們。朋友告訴我：周家所住的兩間平房是全村最破舊的，因年久失修，門窗都掉落了，寒風直往屋子裏灌。家裏沒有一件像樣的傢什，連僅有的幾張板凳都已破爛不堪。別人家看上彩電都已有很多年了，但周家連一台黑白電視機都還沒有。周母患神經性面癱，臉部扭曲，僅剩下幾顆殘齒的牙床整個裸露在外面；周父常年哮喘，身軀蜷曲也已失去勞動能力。這些年來我們給他們轉去的救助捐款，僅夠兩位老人艱難度日而已。98年長江鬧大水，周家顆粒無收，房子也被沖壞了。99年周父重病垂危，被人用門板抬到了醫院。如果不是及時給他們追加救助，景況可想而知。我常常想，如果他們的兒子不死，他們會活得這樣淒慘嗎！

但是，就是對這樣兩位勉強維持著殘生的老人，共產黨的官員也還不肯放過他們。98年我給周家寄去的捐款，居然被村上的共產黨書記冒領了去，最後還是由我出面交涉才退回給了兩位老人。去年秋天，周家再遭侵擾。這回是村幹部帶領鎮上派出所的民警一行5、6人開著吉普車到了周家。他們脅迫兩位老人“老實交代”接受北京匯款的情況，說是要再發現有北京來的匯款，他們就立即扣下。他們厲聲惡語地威脅兩位老人：今後不得擅自離村，出門要事先向他們“請假”，回家還要向他們彙報；如有外人來訪，也要立時報告。這種強加的侮辱性規定，同毛澤東時代對待所謂“五類份子”的做法有什麼兩樣！我常常想，同樣都是人，甚至共處一片土地、同住一個村莊，為什麼竟能如此不把別人當人來看待？！中國的所謂“改革開放”也已經有20多個年頭了，為什麼還不能把那些侮辱人、作賤人、把人不當人的做法稍稍改變一下呢？為什麼還不能稍稍打開一點門戶讓中國的老百姓也能享有到一點在別人看來已經象穿衣吃飯那樣普通的人權和人的尊嚴之類東西呢？我想，這也許就是一位“化外之邦”的總統要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兜售”他那個為權貴們所不屑的“西方價值”的緣故吧。

一個家庭就這樣被毀了

下面，我要說的是另一位“6·4”死難者——北京農業大學園藝系碩士生戴金平。那年他畢業在即，本來有一個很好的前程，家人也有了一個盼頭。但是，轉瞬之間這一切都成了泡影。

農大在“6·4”事件中有一位研究生遇難。我是在“6·4”後不久就知道的。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苦於查不到線索。一直到11年以後，即2000年冬天，我才從難友蘇冰嫻女士那裏得知死者的有關信息。那是蘇女士的一位老同學、一位農大教授無意間向她透露的。之後，蘇又設法得到了戴的親屬在湖北農村的地址。但是，還沒有等到與這家難屬取得聯繫，蘇冰嫻女士卻突然離開了人世。蘇的不幸去世猶如青天霹靂，使我陷入了極度的悲痛之中。但是，當我一想到蘇生前把這家難屬的地址交到我手上的情景，我立即意識到我必須馬上去完成這件她生前未了的事情。於是，我沒有等到辦完蘇的喪事就給這家難屬發出了查詢的信件。

幾天後，我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終於收到了這家

難屬的回信。但信中所述卻令我難以卒讀——想不到這又是一個苦難深重的家庭！信中說：自戴遇難後，這個家庭僅有的一點希望落空了。隨之而來的是，戴母因悲傷過度，常年疾病纏身，完全喪失了勞動能力。戴家本來屬於湖北的貧困地區，而且是一個沒有任何其它收入的純農戶，現在一下子陷入了困境。為生活所迫，戴父不得不隻身遠走他鄉去了武漢，靠出賣苦力打工養家。但想不到在以後的幾年裏，這個不幸的家庭竟又連遭厄運。95年，戴家的小兒子突患神經分裂症，家裏又失去了一個勞動力。98年，外出打工的戴父在武漢的漢正街無緣無故地被歹徒打死，未了還落得個狀告無門的結局。一個家庭就這樣轉眼之間被毀了，只剩下了一個無依無靠、被疾病折磨得幾乎難以支撐的老婦人。對於這樣一位連遭劫難的農村老婦來說，還有什麼比這更殘酷的呢！

讓我們記住這些名字吧！

這些年來，程仁興、周德平、戴金平……這一個個仿佛仍活著的名字，常常縈繞於我的腦際，令我難以忘懷；而當我一起想起這些名字背後一個個如此不幸和苦難的家庭，更令我寢食難安。我苦於不能經常給這些家庭寫信，因為信件常常遭檢查和扣沒；我也苦於不能在電話裏把要說的話明白說出，因為我的電話是受監控的，我怕給他們帶來新的傷害。但是，我又無法把他們放下。我給他們轉達救助捐款，每一次都總是提心吊膽地盼著能早日收到他們的回條，因為，如果手續上出一點差錯，或者捐款中途被截，我知道這對他們將意味著什麼。為此，我不得不謹慎從事，仔細考慮每一個環節，轉上好幾道“彎”才把捐款安全地送到他們手裏。

這就是我和這些受難家庭時時刻刻都要面對的現實。它是那樣的黑暗和險惡，那樣的虛偽和冷酷，那樣的令人憎惡。

今年春節期間，我從電視屏幕上看到各級黨政要員們一窩蜂地跑到邊遠地區去“訪貧問苦”，口口聲聲說要關心“弱勢群體”。我心裏不由得一陣噁心。今年3月，我又從兩代會的電視報道中看到有那麼多“人民代表”慷慨陳詞，口口聲聲說要關注“農村的貧困”。我又不禁一陣噁心。現在，演戲的時節已經過去，供他們表演的場地也已收拾乾淨，還有誰能見到他們再去問一問農民的死活和疾苦！我看透了這個制度的虛偽和腐敗，更看透了那些黨國大員的假仁假

義。他們整日價把所謂的“三講”、“三個代表”挂在嘴上。但他們除了關心自己的權位和錢袋，有幾個真正把老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一切都被他們“代表”去了。老百姓除了任由他們欺壓和宰割，還敢說什麼、還能說什麼？

讓我們記住周德平、程仁興、戴金平這些名字吧！他們是敢於把那些假仁假義的大員們、“代表”們推到一邊，用自己的行動、自己的語言站出來說話

的人。他們帶著家鄉父老的囑託、帶著神聖的使命感，走出了家鄉，又走出了校門。他們已經倒在了天安門廣場上，倒在了“共和國”的旗杆底下。我不知道是否還有人想起他們。但我相信，他們的名字將被歷史記錄下來，作為一個時代的象徵。

（寫於2002.4.19）

〔轉載自《人權通訊》；chrq2002@yahoo.com〕

（轉載） 茫茫人世中的一點亮色

——“六四”十三周年感言

丁子霖

一位素不相識的朋友，多年來一直默默地關注著中國人民大學靜園一樓43號周圍的動靜。在世紀之交的一個早春，他悄悄地攝下了房前迎春花叢盛開的景象，以寄託他對死者的哀思和對未來的期盼。

這是我丈夫為一幅照片所撰寫的題詞。它是一個故事，一個在茫茫人世的悲愴中透出亮色的故事。

那是在去年歲末的一個極平常的夜晚，我正拖著一天的疲憊準備歇息，忽然聽到院門外有輕輕的叩門聲。我勉強打開了大門，原來是一位素不相識的中年男子。他身上裹著厚厚的羽絨服，連衣的帽子把頭部包得嚴嚴的，腋下還夾了個扁平的紙包。我從他半露的臉上仔細端詳，卻認不出是誰，心裏正有些納悶。陌生人先開口了。他說他住得離我們不遠，常常來人大走動，早已認識我們了。

於是招呼他坐下，聽他作自我介紹。對自己，他說得很少，大概覺得這並不重要；但對我們，他卻知道得很多，也很清楚。他說他每次來人大都要從我們的住家前面經過，這麼多年來一直默默地關注著這裏的動靜。他從我家陽臺上是否晾曬衣服、院子裏積土的多少來判斷我們南來北往的行蹤；從我家門前“便衣人員”的人數和警戒狀態來判斷我們處境之安危。他甚至注意到去年“六四”期間我家門前多年來第一次沒有停靠來歷不明的小汽車，也第一次沒有見到那些

似曾相識的面孔。

從他的言語間我聽出他想要證實些什麼。我於是如實相告：“有時他們（指便衣警察）還來，但來的次數少些了；只是電話仍受到監控，大概方式有所改變吧。”我盡量把語氣放得緩和些，以解除他的疑慮。因為這麼多年來，人們一說起靜園一樓43號，就如同說的是令人生畏、卻步的虎穴，即使是最熟悉的朋友，也會產生一種莫名的恐懼，更不要說貿然登門了。

也許因為是初次見面，他顯得有些局促、矜持。他說他這次來訪，只是想讓我們知道，我們並不孤立，人們也沒有忘記“六四”。他說儘管平時沒有交往，碰面也不說話，但很多人都一直在關注著我們，希望我們保重！

說著，他打開了隨身帶來的那個扁平的紙包，撕去裏面的另一層包裝紙，原來是一個普通大小的長方形鏡框。再仔細一看，鏡框裏夾著的是一張彩色照片；整個畫面被一朵盛開的迎春花牆占去了大半，沒有人物，也沒有其它引人注目的景物。

“這拍的是哪里啊？怎麼我有點眼熟！”我不解地問。

“這就是你們家呀！怎麼您認不出來？”

我這才醒悟過來，認出了那幅照片的拍攝地點。

原來這些年來，我們等不到房前的迎春花開就離開北京去南方了，而當我們於5月下旬返京時，所能看到卻已經是一堵濃密的綠牆了。因此在我的記憶裏，幾乎沒有留下他那幅照片所拍攝下的景象。何況，這些年來，無論是我自己，還是我丈夫，也都再沒有一個好心情去照料院內院外的那些花花草草了，久而久之，也就產生了一種生份感。這對我來說，固然是辜負了大自然的一番美意，但又何嘗不是一種無法追回的失卻呢！

我不無歉疚地傾聽著他的陳述。

他說，每年春天，當我家門前迎春花開放的時候，他都會發現我家小院內塵土堆積，陽臺上也無任何晾曬的衣物，就知道我們已去了南方，見不到迎春花開的景象了。一連好幾年，都是如此。於是他萌生了一個念頭：何不把這個景象拍攝下來送給我們呢？

他說，北京的春天來得晚，人大校園裏那麼多花木，無論是公家的還是私家的，都沒有你們家的迎春花開得早；而且是整整一堵花牆，而且那金黃色的花朵是那樣的燦爛、耀眼。他說每當這個時節，他都要在我家的這堵花牆前駐足良久，盡情觀賞，然後騎車去人大校園裏到處尋覓，看看別處是否也種植有這樣的迎春花，是否也開放得那麼早。結果他驚奇地發現，整個一個大院，竟沒有第二個地方能看到如此賞心悅目的景象。他說，在人大院內，惟有你們家的迎春花最早給人們帶來春天的信息。

他的敘述讓我感動，也使我生出一種淡淡的感傷。

是啊！愛花是人的天性，花歷來被看作一種有情的物。但對我來說，象愛花、賞花這類事情早已與我無緣了，尤其是在北京這塊傷心地。我已經認不得曾經是自己親手栽種的那些迎春了，它們在我的心目裏，好象依然是十多年前的那個模樣。這是因為，在我的床頭挂著另一個鏡框，同樣是一幅彩色照片，同樣是以家門前的迎春花為背景，不過不是開花的季節。那是89年5月1日我和兒子、丈夫的三人合影。這天正是我們女兒舉行婚禮的日子。由於當時北京正鬧著學潮，所謂婚禮也就只是全家聚在一起吃一頓飯、照幾張照片即草草了事。可是沒有想到，僅僅一個月後，兒子就離開了我們；而那幅照片也就成了兒子生前與我們的最後一次合影。我這十多年來，天天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張照片，能在我心裏留下的，也只是這僅有的一個美好的時刻。那時，我家門前的迎春花還長得

不足一米，而且印象裏也沒有開過花。

現在，我有了另一幅迎春花的照片，它們已長高了，而且已花開滿牆，而且是那樣的燦爛、耀眼；但我反而陌生了。

來訪者告訴我，他之所以要拍攝這樣一張照片，是因為他從我的那本“禁書”（指《“六四”受難者名冊》1994年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出版）上看到了那幅我與兒子、丈夫的合影。他說我們應該有另外一幅照片，不是為了替代，而是為了讓我們看到這個世界的另一面一向人們顯示出亮色的一面，給人以溫暖和希望的一面。

我感謝這位素不相識的朋友，感謝他給我送來了這份春天的禮物。

今年，是89天安門運動和“六四”大屠殺十三周年。在去年的這個時候，我和我的難友曾在一份題為“天安門母親的話”的宣言中說過這樣一些話：

“作為這個群體中的一員，我們每個人的社會地位、生活境遇乃至政治和宗教信仰都不盡相同，但我們作為母親，我們對自己的兒女、對所有孩子的愛，對和平、安寧的向往，對強權、暴行、殺戮的憎惡，對弱勢群體及受害者的同情，卻是相同的，因為這一切都出自一個母親的天性。

“我們將把這種愛視為一種責任，希望以此來呼喚人們的良知，來化解人與人之間的猜疑和仇恨，來改變至今仍遺留在我們頭腦裏的對生命及人的價值的漠視。

“我們相信，這種來自生命源頭的愛是偉大的，它作為一種責任，將使我們變得更堅強、更智能，也將使我們的世界變得更理智、更富有人性，從而更有效地制止暴行與殺戮。

“我們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淚流得已經太多，仇恨已積蓄得太久，我們有責任以自己的努力來結束這不幸的歷史。今天，儘管我們所處的環境仍然是那樣的嚴峻，但我們沒有理由悲觀，更沒有理由絕望，因為我們堅信正義、真實和愛的力量足以最終戰勝強權，謊言和暴政。”我在這裏重覆這些話，是想讓所有相識和不相識的朋友知道，在我的內心深處，一直存在著這樣一種希冀，而且，我也意識到自己有這麼一份責任。今天，在我們所生存的這塊土地上，災難仍在繼續，生命也仍在繼續，但我們所需要的卻不應該是等待！

2002年4月22日

失業與再就業形勢嚴重

張開

下崗失業人數不斷飆升

中國實行全面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後，企業以利潤掛帥，盡量裁員增收，下崗失業職工原本已不斷增加；在加入世貿後，價廉物美的外國工農業產品將大量湧入，衝擊中國的工、農、副業，企業要加劇調整，破產、兼併、重組等行為更加頻繁，導致國企和弱質產業的就業崗位更加大量減少，下崗失業工人大量增加；此外，9.11事件後，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逐步顯現，中國出口貿易遇到很大困難，也將對中國就業更加造成不利影響。因此，下崗失業工人人數，在可見將來許多年內，勢必大大飆升，成為中國當前和今後許多年內最為嚴重的經濟、政治上困難問題。

面對著當前這種嚴峻形勢，中國官方被迫逐步升級地宣佈更多的下崗失業人數，和更高的城鎮登記失業率。但宣佈的有關數字，卻大有不同：

一方面，國家計委主任曾培炎在今年3月上旬向全國人大會議報告，到01年年底，中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6%，失業人員和國企下崗職工總量為1200萬人左右，其中下崗職工總數為515萬人，登記失業人數為685萬。而據權威部門預測，到2002年末，上述兩者總數將增至1400萬人左右，其中，城鎮登記失業率將上升到4.5%左右，失業人數比01年末將增加2百萬人。（1）

另一方面，今年4月29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的《中國的勞動和社會保障狀況》（以下簡稱《白皮書》）則宣稱：「1998年至2001年，中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累計有2550多萬人，其中1680多萬人實現了再就業。」這應該是顯示，還有870萬人左右沒有再就業而在「下崗」中。這與曾培炎不到兩個月前向全國人大報告的515萬下崗人數相差很大。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王東進在上述白皮書公佈的同時公開承認：中國正面臨嚴峻的就業形勢，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數量出現了一個未預測到的高峰。未來幾年，中國每年有1200萬到1300萬的人口進入就業市場，即使中國保持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7%，每

年也只能新增8百萬個工作機會，即每年新增失業人口有4至5百萬，至2005年底會再增加2千萬失業軍。（這也與上述的今年底將新增2百萬個失業人數相差很多！）

中國社會科學院最新出版的《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綠皮書，就中國入世對中國就業形勢的影響指出：從近期看，將使城鎮失業人員額外增加3百到4百萬人，失業率因此將攀升兩個百分點。入世對中國傳統行業帶來衝擊，打破原來就業格局，導致就業矛盾尖銳化。按行業分析，其中農業所受衝擊最大，就業量大約減少1千萬人，即意味著農村剩餘勞動力增加（2）。儘管該報告估計，長遠來看，入世會增加2至3百萬個工作機會，但這是許多年以後的事，而在近期內，入世卻加劇了失業的嚴重性。

官方數字顯示，中國城鎮登記失業率，在今年3月底已遠高於年初水平攀升至3.7%，但中國社科院人口研究所估計，實際的城鎮失業率會徘徊在5%至6%之間（3）。不少學者更估計會高達20%。而隨著入世的不利影響日益顯現，即使是官方的城鎮失業率也將日益升高。

失業危機日趨惡化，中國當局如不急謀對策，解決下崗失業工人的當前生活困難，則他們在走投無路、求助無門的時候，便會集體起來爭取其應有權益，要繼續享有過去的福利、追討拖欠的遣散費、退休金，要有生存權、工作權……，像今年3月間各地工潮湧起那樣。這種行動繼續擴大、惡化，勢將影響社會的穩定，從而威脅到中共的統治地位。

因此，中共不得不重視這個問題，而提出應付辦法。其中首要的是宣佈實行「積極的就業政策」，採取各種措施，促進就業。有關的措施包括：引導有利於增加就業機會的產業和企業的發展，重視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特別是就業容量比較大的服務性企業和中小企業，實行靈活多樣的就業形式。

靈活就業的困難和問題

關於靈活多樣的就業形式，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課題組發表了文章（題為《靈活就業：

解決再就業問題的重要途徑》) (4)，大力提倡這種涵蓋領域很廣的途徑，指出它第一類是在小型企業和家庭作坊的就業，如臨時工、季節工、承包工、勞務工、小時工、派遣工等；第二類是半日性、階段性、兼職性的、推銷員等；第三類是自僱型、自主性的就業。但它跟著即詳細列舉出它們目前存在的諸多困難和問題，主要有：

一、開辦小型企業和從事個體經營，面臨著不利的政策環境。例如，它們很難得到貸款，難以得到稅收政策方面的照顧和優惠，各地雖有優惠政策規定，但落實情況普遍不好；而且缺乏經營場所，容易招致城市管理部門取締和禁止，又缺乏市場信息、諮詢等體系服務的幫助；

二、現行社會保障制度與促進靈活就業發展的要求嚴重不相適應，從事的人員普遍沒有社會保險，留下了嚴重的社會隱患；

三、靈活就業者的權益得不到保障，成為普遍而嚴重的問題，其主要表現在：工資報酬低於法定的最低工資標準，拖欠、剋扣工資情況嚴重，工作超時，且無加班費，勞動和安全衛生條件惡劣，隨意被僱主解僱，等等。

這些困難和問題，如果不及時解決，就將會大大影響靈活就業的發展，減低這條吸納下崗失業者的渠道的作用，從而使中共要擴大就業的計劃遭到打擊。

原有受保障的權益大遭削減

在下崗失業人數日益大增的近期內，國家和原有企業本應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去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和工作的問題；但前述的《白皮書》，在洋洋灑灑地列舉出這樣那樣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同時，卻對下崗失業工人的再就業採取推卸責任的態度說：「中國政府實行『勞動者自主就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的就業方針，鼓勵勞動者通過公平競爭獲得就業崗位、支持用人單位自主決定用人的數量和質量，並採取多種措施促進市場導向就業機制的形成。」這就是說：勞動者要自行解決就業問題，在現時「僧多粥少」的激烈競爭中，被迫要接受被壓低的工資待遇和工作條件，用人單位在追逐利潤導向下有權如何僱用或解僱職工。這樣的機制完全有利於用人單位而不利於勞動者，與改革開放以前勞動者權益所受到的保障大為不同。

現在的改革是：工人被「下崗」失業後，原來的

國有企業便不必對他們負責提供起碼的生活保障和福利，而把他們推向社會，先由再就業服務中心發給最長可領取3年的基本生活費（數額低於最低工資標準）；3年期滿仍未再就業的，可領取更低數字的失業救濟金；期滿仍未就業的，可申請領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這樣，最長經過5年之後，下崗工人便被降為一般失業者 and 城鎮貧民一樣，由地方政府負責發給最低的生活費。這是《白皮書》所列明的對下崗失業工人的「社會保障」辦法。而社會保障基金的來源之一，是出售國有企業所獲的資金，以及國家財政的投入等，但出售國企所得的資金卻是很不穩定的。

與過去由國有企業全部支付職工醫療費用不同的，《白皮書》列出的醫療保險制度，是要由用人單位和參保職工分別供款，用人單位所繳交的一部份和參保職工繳交的劃入個人賬戶，分別承擔不同的醫療費用，前者主要用於支付住院和部份慢性門診治療的費用（設有最高支付限額，意味著超額的須由個人負責）；個人賬戶主要用於支付一般門診費用。由於改革後醫療費用劇增，以致許多城鎮病患者無法支付高昂的費用，而得不到有效的醫治（農村的病患者則連這種基本的醫療保險福利也沒有）。

× × × × × × × × ×

總括以上所述可見，中國工人階級既大量受到下崗失業之苦，想再就業又很難，過去的免費享有的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福利制度更被「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所大大取消了。這些是導致工人日益不滿和起來抗爭以爭取其應有權益的主要原因。（關於工人這些抗爭，請參看《十月評論》刊出的有關文章。）有理由相信，由於這些情況的繼續惡化，社會矛盾繼續尖銳化，工人以及其他勞苦大眾的抗爭行動，將會不斷爆發，最後導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和中共統治危機的激烈化、表面化。

2002年6月15日

註釋：

- (1) 02年3月5日《文匯報》報道。
- (2) 5月24日《星島日報》報道。
- (3) 6月5日《星島日報》報道。
- (4) 見5月23日《人民日報》。

大慶工潮綜述

陳泰

鐵人創業：“拿人肉換石油”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國共產黨政權在經過几年的猶豫、觀望后，被迫走上了計劃經濟的道路，大陸工業化也從此進入高潮。1960年，毛澤東親自批准并調集3萬轉業官兵以及全國各地的大批石油工人參加黑龍江省大慶石油會戰。在這片雪原上，40年來共打下油井26000多口，成為中國大陸目前最大的油田，也成為世界上為數不多的特大型砂岩油田之一。大慶40年來累計向國家上繳稅費2000多億元，相當于國家投資的44倍。1999年，大慶油田實現了自1976年來的第23次年原油產量5000萬噸。

大慶創業史，和王進喜這個名字永遠連在一起了。王進喜，1923年出生于甘肅玉門亦金村。6歲時因家貧，用棍子拉著雙目失明的父親沿街乞討，8歲時給有錢人家放羊。1938年他進玉門石油公司當徒工，干活時被砸傷了腿，被廠主趕出大門，傷好后才頂了別人的名字混了個差使。當時，玉門油礦的美國技師壟斷了采油技術，王進喜在礦里干了十几年雜工，沒有上過一次鑽台，沒有摸過一次石油鑽機的剎把。五十年代初，王進喜當上了國營甘肅玉門石油管理局勘探公司三大隊的石油工人，副司鑽，1956年升任1259鑽井隊隊長，同年入黨。王進喜率領的1205鑽井隊在1953年到1959年7年間，共完成鑽井進尺71000米，等于中國1907年到1949年42年鑽井進尺的總和。在1958年，他領導鑽井隊創造了月進尺5000米的全國紀錄，成為中國中型鑽機最高標杆單位，榮獲“衛星井隊”紅旗，被命名為“鋼鐵井隊”。

然而，50年代前期美國石油年產量達3億噸，中國的石油年產量不過100萬噸。1959年王進喜到北京開會，看到首都街頭的公共汽車因缺油背著煤氣包，作為采油工人，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大慶石油會戰展開后，王進喜從玉門油田率領1205鑽井隊趕到當地的馬家窯。1960年4月14日，大慶第一口油井開鑽，不久即噴出原油。由于缺少資

金、技術和足夠的專家，大陸工業化的過程，就是一個中國工人階級用血肉之軀“土法上馬，戰天斗地”的過程。在石油工人的萬人大會上，王進喜曾振臂高呼“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寧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剛到大慶時，工人們吃的是苞米面炒面，沒有睡覺的地方，就在鑽井附近挖一道溝，墊上茅草，上面搭起棚子，用來休息，這就是所謂的“地窩子”。

在玉門的時候，很多鑽機因為沒有鑽頭而停鑽。當時還沒有國產鑽頭，靠進口來不及，王進喜便組織工人從廢料堆里找到一些舊鑽頭，架起大鍋煮去油污和泥沙，擦去鏽，修修配配，拼裝成可用的鑽頭，用了半年打了5口井，節省了開支，又不耽誤生產。大慶創業初期，沒有公路，吊車、拖拉機不足，設備在火車上卸不下來。王進喜帶領全隊30多個人用繩子拉，撬杠撬，木塊墊，把60多噸重的鑽機一寸一寸地運到井場。打井需要水，可當時沒有水管線，沒有水罐車，為了搶時間他決定……用臉盆端！有人苦笑著說：“沒見過哪個國家端水打井的”。他回答道：

“就是尿尿也要讓機器動起來”。工人們硬是用臉盆端來了几十噸水開了鑽。鑽第一口油井時，王進喜的腿被砸傷；鑽第二口油井時，為了防止發生井噴，需要灌入水泥，但是現場沒有攪拌機。王進喜在身上有傷的情況下，同大家一起縱身跳進泥漿池，用身體攪拌泥漿。井噴終于被制服，保住了油井和鑽機，王進喜身上卻被鹼性很大的泥漿燒起了大泡。從此“王鐵人”的名字傳遍了油田，并很快響徹了全中國。

就這樣，從1960年6月1日大慶運出第一批原油，到3年之后油田會戰結束，中國結束了用“洋油”的時代，實現基本自給。這個奇跡同當時許多工業奇跡一樣，是大陸工人們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在那個有計劃經濟沒有工人民主的年代，王進喜身上集中體現了當時大陸工人階級的兩重性：既有某種“當家作主”的自豪感和希望，以及由此產生的大無畏犧牲精神和創造力，同時也滋養了對自己的單位以至「國家」的深刻的依賴性和政治消極。王進喜的

傳奇，使他成為毛時代特權等級制度的一塊遮羞布。他1961年當了大隊長，1964年出席了第三次全國人大會議。1965年他任油田鑽井指揮部副總指揮。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他以工人代表身份當選中央委員。鐵人是作為一頭任勞任怨開荒牛進入中共官僚系統的。毫不奇怪，在1964年第三次全國人大會議上，他對有的代表對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投反對票大吃一驚，高呼“抓壞人”。

1970年王進喜死了，死于胃癌：真正的“積勞成疾”。但大慶石油工人還活著。几十年后的今天他們深深感到自己被出賣了。在今年延續了兩個多月的抗議運動期間，一名抗議者直白地說：“當初大會戰，吃的是帶冰茬的饅頭，住的是干打壘，十月份工地就凍得像鐵塊，鑽井都靠手工，是拿人肉換石油。現在一句“減員增效”就把我們當包袱甩了，這心里沒法平衡”。不平衡就要鬧亂子。

工潮的起因

2000年11月20號大慶石油管理局和石油公司的五萬多職工在管理部門的軟硬兼施下，被迫同意買斷工齡。每年工齡按照4500元人民幣計算。第二年又有三萬人辦理了相同手續。買斷就是有償解除勞動合同，資方按照雇員工齡長短向后者發放多少不等的一次性遣散費。大慶工潮的導火線，源于當時管理部門撒的一個大謊，口頭答應“買斷職工到退休年齡后享受石油管理局在職職工退休待遇”，據工人自己承認，這一條并未明文寫入買斷合同，而是以“領導講話”和管理局下文件等中共官僚傳統工作方式傳達給群眾的。管理局的頭頭們正是利用大慶工人對中共的殘余信任設置了一個大騙局。僅退休金一項，每年管理局可以少支付人民幣十億元。

買斷期間，管理局對工人的動員手法，也精彩紛呈。石油管理局副局長曾玉康（現任局長）在“關於在職職工和退養職工買斷工齡的說明”這一關於職工買斷工齡的政策性電視講話中說：“現在局里經多渠道請示匯報，費盡周折，在上邊給你們爭取了這筆來之不易的獎金。也可以說是一次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如果現在不把握這次機會，就過這村沒這店了。如現在不買斷，將來企業要做新的調整，局里要裁減一半職工。如果你們不買斷，企業效益不好，開不出工資就沒人負責你們了。將來下崗也就是你們這個年齡段的，只發兩百元生活費，三年后連生活費都沒有了，

直接推向社會。到時別說沒給你們機會，可別怪我們”。一位40多歲女工表示，當初她在的廠領導先是嚇唬說“不買斷就下崗”，然后給大伙放了一周不帶工資的假。這當口局里公布了67個帶頭買斷的科級干部。工人回去一看基層領導全是新面孔，廠領導立刻開大會讓所有人添同意買斷的表格，簽字時有當場哭的，有罵“比黃世仁還毒”的，連有的人請求“回家跟老公商量商量”，廠領導也不讓。

要指出的是，管理局不僅事實上欺騙了買斷職工，而且直接違反了大陸《企業法》的有關規定。2000年11月8號下發了買斷問題主導性文件—慶局發（2000）117號文件“關於印發有償解除勞動合同的實施辦法的通知”。按照企業法的規定，企業的重大決策或重大事項必需得到企業職工代表大會討論決定，而17號文件恰好沒有經過職工代表大會這道程序。

買斷后的工人不少人想拿這幾萬塊買斷費干點小生意，但由于大陸特別是東北三省近几年嚴重的經濟危機，這類小生意大部分都不賺錢。許多人買了汽車搞運輸，結果往往攬不到活，車被撞、被偷搶的倒不少，搞得焦頭爛額。2001年買斷職工得到黑龍江省保險公司的通知，要求每人交納3600元醫療和養老一級（或是2800元的二級）保險，大家都很吃驚，因為管理局在層層傳達中說買斷后每年每人只交2600元保險，到退休時享受在崗職工同等待遇。一些對此不滿的買斷職工找到原單位，被頂了回來。大部分人忍下了。今年（2002年）省保險公司的保險費用已漲到1萬元，最低的六級保險也要4100元。保險級別越低，受惠程度越低。與此同時，令買斷職工普遍不滿的，還有日益嚴重的青年失業問題。自1996年開始，市內專科、技校畢業生不包分配。許多買斷職工和在職職工家里都有子女失業。管理局每次招工几十上百人，報名的往往達到几千几萬人。大慶人鼓噪起來了。

三月一號這天大慶石油管理局大院和院前的鐵人廣場上人山人海。以后的几天里抗議人數一直在兩三萬人。四周貼滿了大、小字報。三月四號上萬人攔截了途經大慶的國際列車。從三月十號起，每天參加請愿的人數保持在上萬左右，受到群眾沖擊的單位除大慶石油管理局外，還有市工會、大慶日報社、市石化總廠，管理局停止工作。三月十九號，大慶市公安局發出通告，聲稱要對“少數別有用心的人”予以制

石油管理局的對策

工潮起來以後，管理局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本著把工潮堅決壓下去的原則，想出不少對策。

辦法一：鎮壓、恐嚇。抗議運動剛一開始，大慶周圍四縣三市的警力就大批調入市區。從哈爾濱調來了防暴隊。國際列車被截的事發生後，曾玉康立刻要求調集武警部隊，這個要求被滿足了。除了保衛管理局大樓，武警更是沿鐵路線部屬起來，以防群眾搶火車進京。兩個多月的運動期間，群眾多次選派代表與局方談判，結果代表們個個有去無回。公安人員在現場盯著誰鬧得最歡實，就在這些人回家路上把他們秘密拘禁起來。被抓進去的人要交一百元鋪蓋費，外加每天十元錢伙食費。吃的是饅頭、苞米面饅頭、咸菜，一天兩頓。被抓的人需要添寫保證書，發誓不再參與鬧事。公安查得最緊的，是到底在職職工有沒有參與進來。

辦法二：人盯人的動員戰術。管理局傾盡全力，派出大量的人手，到鐵人廣場上動員群眾回家。一開始遵循的還是單位一黨組織的路線，派出老領導、老支部書記跟大家談。受到一頓臭罵和冷嘲熱諷後，那個躲在暗處的“心戰指揮部”改用親情風格了。派人先找買斷職工的家屬、親戚、好友座談，逼他們去懇求、哀求、責罵自己買斷工齡的丈夫、妻子、父母、岳丈、大舅子、小姨子、二十年的好友、三十年的同事待在家里，哪兒也別去！一位買斷職工說，他家里不斷來人，早上六點半就敲門，晚上九點多還不走。氣得他幾次要抄菜刀逐“客”。另一位說，他幾個舊同事都來家里找他，說如果他再去廣場，他們的獎金就全扣了。他老婆還在上班，單位讓她動員丈夫。管理局下面的生產單位因為大量抽人從事動員工作，已經痛感人力不足，有的單位從四班倒轉為三班倒。四月二十三號約有三千人參加抗議，到廣場上動員他們的就有一千多人。

辦法三：大造輿論，挑撥在職職工與買斷職工的關係。二月份的獎金至今沒有發到工人手里，管理局層層傳達：“全是買斷的給鬧的，找他們要吧”。四月二十三日管理局還在晚間電視里搬出一些老模範，包括鐵人的弟弟，大講“大慶好，我們才能好，要安定，不要動亂”。

辦法四：小恩小惠，分化瓦解。3月25號管局在鐵人廣場上大喇叭廣播宣布2001年的取暖費不用交了，此外局下屬的退休人員活動室也重新對買斷職工

裁。大慶事件傳到了海外，又通過網絡、電台廣播傳回國內。三月二十號上午，發生了朱大勇撞人事件。當日約八千人聚集在管理局大院和鐵人廣場上，警察按照規定，封住路口，所有車輛繞道而行。只有一台汽車突然闖入戒嚴區，然後司機朱大勇下車掏出鐵鏈向周圍人亂打。經群眾還擊後，警察保護他回到駕駛室，然而無人料到的事發生了：朱大勇非但沒開車走，反倒加大油門向群眾沖去，連撞五六個人。肇事人朱大勇被拘捕，受傷的人進了醫院。第二天，市公安局又發出通告，莫名其妙地威脅要找出“毆打朱大勇的犯罪分子”。

進入四月，運動頑強堅持著，就是不肯散伙。四月十九日上午十點大慶市公安局突然對石油管理局大院、鐵人廣場進行了包圍，執行的有武警、一般公安和管理局雇用的經濟警察（也就是非官方的保安）。公安局的廣播車宣布：“鑒於廣場上混入了法輪功邪教分子和不明身份的人，需要對在場的群眾行驗明身份，請大家不要離開”。十點四十分大批警察分路涌入廣場，開始檢查身份證並大量抓人。總共用了十二輛大型公共汽車運送被抓的群眾。四月二十二日早上來廣場的群眾又有七、八千之多。一大早公安局的廣播車就宣讀市局的戒嚴令。大伙被擠在廣場邊上，鐵人像附近派了警犬找爆炸物，管理局大院正門上了鎖。當日上午由市公安局組織了一批扭大秧歌的，想在廣場上扭，但當天氣氛實在緊張，沒敢進來。四月二十三日來的群眾已下降到不足三千，扭大秧歌的在公安護送下進了場，扭起來。每個扭大秧歌的一小時給二十五塊錢。一名群眾罵了幾句，被四個公安當場抓了，連踢帶打，弄上車還在打。四月二十三日晚間電視播發了管理局的所謂“回復”，聲稱“養老、醫療保險交費問題，應由省保險公司和有償解除勞動合同人員協商解決”，“返崗上班，以及有償解除勞動合同人員享受同等退休待遇是不可能的”。四月二十四日到廣場的群眾已不足一千。五一期間，大慶又多次發生數千人的請愿活動。

抗議群眾的要求大體如下：

1. 取消買斷政策。
2. 參照市政辦法，給年齡較大的買斷職工和干部提前辦理退休手續。
3. 35歲以下買斷職工和殘疾人（因工傷下崗人員一我注）返崗上班。
4. 對單職工的家屬在房改等方面增加補助費、生活費。
5. 採取慎重態度解決待業青年就業問題，特別年齡較大的待業青年就業問題。

開放。四月中旬管理局成立了“有償解除勞動合同人員再就業中心”，號召買斷職工去登記，答應給找工作，目的無非也是爲了分散廣場壓力。四月二十三日大慶石油公司書記蘇樹林招開買斷干部座談會，這是由於一直傳言七個買斷的處級干部是這次抗議行動的幕后黑手。

中央政府的態度

三月二十四日，鐵人廣場上大喇叭廣播了國務院調查組負責人（國務院經貿委的主要領導之一）在大慶的講話。這位“黨派來的貼心人”直言不諱地表示：“有償解除勞動關係合同是深化企業改革、順應市場發展的客觀需要的必要措施。是完全合法的，必要的”。對大慶人的不知好歹，他感到莫名其妙：

“大慶的有償解除勞動關係合同，是雙方自願的，是嚴格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辦理的。……你們拿了這麼多補償費，大大高於一般標準，爲什麼還有意見？”。所以，大慶管理局和石油公司的狗官們不但無罪，而且有功：“中石油、中石化集團領導看的較遠，有優患意識，中石油的改革措施，受到了國務院的充分肯定”。接下來，他一語道破天機：“……大家知道，我們已入世了，壓力很大”。既然壓力這麼大，自然某些人要犧牲：“談論較多的是子女就業問題。企業發展了，就會招工，走下坡就會裁員，資不抵債就會破產。企業發展是一個過程，有發展才有招工”。

發展企業靠誰？當然不是什麼工人階級，“鐵人”該滾蛋了！“……要發展非（采）油產業，油采光了怎麼辦？這需要大量資金，誰來投資？創造好的投資環境不容易，毀掉卻不難”。工潮自然屬於破壞投資環境的傷天害理之事了：“……給大慶造成了損失，在全國石油系統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無人投資，誰能就業？極少數人的過激行爲，已引起多數有償解除勞動關係合同職工和全體大慶人的不滿和譴責”。怎麼挽回損失呢？“對別有用心的人，一定要堅決打擊，絕不手軟”。就是這樣。

法輪功的影子

大慶的法輪功信徒在黑龍江省是最積極的。這次工潮一冒頭，當局就急不可耐地聲稱法輪功的黑手在作怪。被抓的群眾往往要證明自己與法輪功與無關。這種說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實？一位50多歲買斷職

工表示，在大慶有四股不滿力量，“一是買斷職工，已經出來鬧了，二是失業青年，三是老工人家屬，還是大集體工人身份，不給轉成正式工，也沒什麼福利。四就是法輪功”。這個組織的下層確實聚集了不少對社會不滿的人，和目前最受欺負的老、弱、病、殘人士。這些人本身是買斷職工，或同情、參與過工潮，都是非常可能的。法輪功並無具體的政治綱領，老百姓中的絕大多數人也不同情它，所以它基本不可能掌握大陸各地抗議行動的領導權，儘管它的會眾對某些行動一定有所參與。

工人迫切需要自己的組織

工潮初期，一個叫“大慶石油管理局買斷工齡職工臨時工會委員會”的組織一度活躍過，但在高壓下很快消失了。不斷有人貼出大、小字報，無形中起著某種指導作用，但也僅此而已。一些活躍分子戴著毛澤東像章，很難說他們確實是所謂的“毛派”，還是僅僅把毛的像章當成保護色。每天參加集會的人自發地按照過去生產單位聚集起來，但看得出，仍然沒有一個多少發達些的組織。沒有組織，讓群眾痛感沒有下一步行動具體目標。在職職工也沒有被動員起來。由於沒有組織，以及資方和國家機器的打壓、疲憊感等，運動已走向最低潮。怎麼辦？

一些群眾試著回答這個不簡單的問題：

“現在大家都有點累了，一有風吹草動，還得起來。大慶老百姓的日子以後會越來越不好過。管理局早晚會撤銷，這是大勢所趨。到時候一切下放給地方，什麼補貼呀，補助啊，都沒了。我們（工人）得有組織”。

“現在絕大多數人並沒到揭不開鍋的程度，爭的也不是一時之利，而是長久的待遇，所以大家支持得住。……89年學生運動夭折了，我覺得我們夭折不了”。

“我們不能半途而廢，不管現在你們在幹什麼事，快放下來吧，投入這面臨飢餓的鬥爭中吧，這一我們不戰勝曾玉康，我們就沒有美滿的生活，我們就會面臨下半生的淒慘和家破人亡。……這就是我們生存的決心！我們記住一句話：只要有決心，鐵棒磨成針。麵包會有的，牛奶也會有的”。

12/5/2002

遼陽鐵合金廠職工公開信

尊敬的黨、政、工、青各位：

想當初多少名人志士認為"破產好"，如今"一破了之"就這麼要拉倒。烏乎哀哉！這樣不行。不行，絕對不行！我們遼鐵職工決不答應。夢想不成真，難平民眾心。因此，我們強烈要求，堅決要問：這到底是為什麼？有沒有人為工人百姓作主？江澤民主席講："各級政府，機關幹部，都要深懷愛民之心，恪守為民之責，善謀富民之策，多辦利民之事"要說真話，辦實事，說話要算數，要取信於民。而市委、市政府個別領導在遼鐵破產前後的所作所為，卻反其道而行之。言行不一。

1. 破產前一年，為什麼向中央打假破產報告？其內容目的是什麼？為什麼至今不敢公開？是不是原腐敗省長張國光 and 原市委書記、市長龔尙武為掩蓋貪污腐敗一手策劃的？

2. 《企業法》和《破產法》都有明文規定，國企破產，必須先清後破，而市委、市政府個別領導，夥同遼鐵貪污腐敗分子，不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工會法》及有關法律，不顧全廠職工的多次強烈反對，致使廠大多數中層幹部、廠級幹部敢怒而不敢言，動用全市公安幹警、武警及專政工具，曾四次抓人，扣人，鎮壓工人的合理抗議和行動，強迫部分職工代表投票同意所謂"破產"其可恥行徑，目的是什麼？敢向工人群眾坦白說清嗎？

3. 職工雖不認同破產，因生米已煮成熟飯，只好認可，但政府至今，仍不下達有關遼鐵破產的正式文件，更談不上兌現和法律效力。其"一破了之"的陽謀敗露。話已說出，不承認行嗎？

4. 2001年11月5日市政府和法院宣佈遼鐵破產之後，不到三天時間，廠內外僅有的物資、設備、門窗等都被洗劫一空，這是誰的責任？破產領導小組成員和破產清算小組到底是想幹什麼？

5. 遼鐵破產的政治影響、巨大經濟損失和法人責任至今沒有追究查處。為什麼？

6. 搞垮一個國企大廠的"十三條蛀蟲"是誰？是根據什麼立案偵察的？根據什麼"雙規"的？根據什麼理由釋放的？結論是什麼？應不應該公佈於眾？

7. 挪用公款、侵吞公款、貪污公款的腐敗分子們，至今贓款贓物共退賠多少？還有多少沒退的？退賠的錢和物都到哪里去了？

8. 破產清算小組至今已存在四個月時間，請問組長劉兆宏等人，目前算清了沒有？還要多長時間？一千萬元的破產費夠花嗎？

9. 遼鐵幾任法人代表失職、瀆職和貪污腐敗的問題，市司法部門、紀檢部門是否在繼續偵查進行？四十餘人的調查組哪去了？

10. 去年"5·17"市法院官員帶頭搶礦事件的內外勾結、上下勾結、製造者、責任者是誰，怎麼結論處理的，為什麼不向職工說清？

11. 拖欠職工工資養老保險本身就是違法犯罪行為，至今遼鐵已破產，拖欠工資必須在今年五月一日之前，無條件償還到位。

12. 假退職工和下崗老工人每月工資182元開到何時為止？原來那部分錢到哪去了？假退職工補繳、糾正保險基數的問題必須兌現。

13. 因破產而失業的職工強烈要求"雙保險"並領取最低生活費。為什麼至今還不給予答覆？此問題沒有調和的餘地。

14. 政府企業與職工單方強制撕毀合同，為什麼不依法賠償職工的經濟損失？《破產法》的職工安置費與《合同法》的賠償費不能混為一談。

15. 用"一次性補償費"、"安置費"繳社會養老保險，當時說多退少補，多餘部分現在為什麼還不給退？

16. 破產前說男55歲，女45歲，給辦退休，繳"雙保險，現在我們要承諾，要證據、文件。為什麼還不給發到手？

17. 職工的住房公積金為什麼還不返還？還要等多久？

18. 拖欠職工醫療費，為什麼還不給報？

19. 享受"一次性補償費"、"安置費"的職工，在各種破產手續沒辦完之前，必須每月照發基本生活費182元。

20. 因工死亡家屬（遺孀）每月只給70元生活費，根本不夠活，這是哪里文件規定的？要求給予最低生

活費182元。

21. 破產前，下崗職工104元，放長假的職工140元，有部分職工始終沒得著。國家規定發放的生活費至今沒給，這筆錢誰扣壓了？必須儘快補發。否則實屬貪污，應追究其犯罪行爲。

22. 退休職工什麼時候能領到勞動保險公司發放的社會保險證？退休工資在廠裏的零頭部分，必須化入工資裏，不給不行！

23. 未轉正家屬工（已七八十歲）的最低生活費、醫療保險，取暖費和未來喪葬費等四項待遇必須給解決，並立下字據。

24. 破產失業職工再就業問題，爲什麼至今還不給解決安排？當時說得挺好，現在怎麼沒人管了呢？

25. 《破產法》說得很清楚，要先清後破。要審計，要清查，要清算各項帳目。弄清楚破產企業領導者（法人）的責任、是非、功過。不能一破了之。如果不是這樣，我們請問，市政府和法院領導，你們宣佈遼鐵破產的依據是什麼呢？不經全廠職代會通過強行宣佈破產，這樣作是違法的，非法的，無效的。爲此，我們將要清除破產清算小組，重新審議遼鐵破產問題。

綜上各條所述，遼鐵職工認爲，宣佈破產，至今拿不出政府正式文件。目的就是用破產掩蓋腐敗，一破了之，一了百了。隨意說法，以權示法，貪贓枉法，損公肥己，坑害職工，使工人無法可依，無章可尋，無證可考，任人宰割。隨意侵害職工的合法權益，說給多錢就給多錢，說拿下多錢，就拿下多錢，有錢時不還錢，沒錢時更不管。廣大職工群眾提出異議，反對個別人的違法亂紀，你們政府就權大於法，公開或隱蔽地抓人、扣人、荷槍實彈鎮壓工人群眾。這都是誰下的令？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是特色的社會主義，還是法西斯、恐怖分子的恐怖主義？市公安局科長王玉成、李光等人竟然說"現在是幫大款（官）來鎮壓群眾的，我們也不愛幹！上支下派沒辦法，要不我們也得下崗？"。可見那些不得人心的昏官是些什麼東西，假話連篇，騙術沖天；上上下下吃的肥頭大耳，卻不給老百姓一點湯湯水水。這樣的貪官污吏還叫人嗎？工人百姓182元的工資，老婆孩子是怎麼過的年，他們知道嗎？

五十歲以下的青壯年給萬八千元，因工傷殘者再給幾千元就讓你回家，"雙保險"也不給上，美其名曰"一次性補償費"、"安置費"，這幾個錢能補償安置

什麼呢？有的人在春節前後將這萬八千的錢，給老人點，給孩子點，過年吃點花點用點，房、水、煤、電費交點，醫院再送點等等點點，現已所剩無幾了。今後怎麼辦？給人打工、託人情找工作，錢花不起；孩子上學、高考上不起，沒住處想買破舊的房子都買不起，只能望樓興歎。三、四十歲的人，在家幹閑，真的閑不起，唯有一條，實在活不起，就得一氣之下去"那裏"---殯儀館還是去不起！

請問政府領導：遼陽還有幾家盈利企業、事業單位招工，私營個體單位也行，有活幹就行，少給工錢也行，就是抬死人的職業，我們也樂意去！這就是大多數破產、失業職工的心計。

總之，人民的政府，就要爲人民著想。人民的公僕，就要爲人民辦事。人民的兒子，就要爲人民效力。黨和政府要把社會上各條戰線抓起來，讓廣大人民群眾，貧民百姓、特別是青壯年失業工人，有個勞動的場所，有個崗位，有個安身之地，千萬不要再搞兩極分化了。否則，窮百姓，就要窮則思變啦！就要造反啦！就要"那個"啦！

近日，根據中央的精神，特別是江澤民主席的幾次講話，我們已給中紀委尉健行、劉麗英發了信，向省委、省紀委，省政法書記丁世發和省公安廳長李峰等人發了信。彙報了遼陽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個別領導與遼鐵蛀蟲及腐敗分子內外勾結，上下勾結；貪污受賄、揮霍國家企業鉅額財產，搞垮遼陽鐵合金廠的犯罪行徑。在此，敬請遼陽市委、市政府中主持正義的領導者，勇敢地站出來，將真話，辦實事，辦好事，千萬不要把黨中央反腐倡廉的指示精神當耳旁風。不要把工人群眾當阿斗。

懇請諸位，一切主持正義的人們，讓我們攜起手來，珍惜光陰，死裏逃生，振奮精神，拿起法律賦予我們的權力和義務這個武器，堅持鬥爭，就能克服一切困難，衝破各種阻力，掃除蛀蟲。就不能亡黨亡國，就有青天，清官爲我們著想，我們才有好日子過。

講法、說理、鬥志，堅持就是勝利！

遼鐵精神萬歲！

此致

敬禮

遼鐵破產職工

2002年3月4日通過

遼鐵破產職工致遼寧省長薄熙來的公開信

尊敬的薄省長您好！

新春佳節已過，改革的春風吹拂了省城大地，遼寧的形勢一片大好，人民安居樂業，生活蒸蒸日上。從省廣播電視節目上看到我省各市乘改革開放的東風，政府給人民群眾做很多好事，實事上，使人們生活不斷提高，城鎮和社區工作不斷加強。特別是工礦企業的社會保障工作也做的很有成就，省內大多數下崗職工都得到了規定的最底生活保障金，破產企業的工人既給了保障金，又給找了相適應的工作崗位，各市政府給廣大城鎮居民提供了一個安居樂業，穩定發展的大好局面。這都是省政府和各地落實江總書記"三個代表"的具體表現，只有這樣廣大人民群眾才能稱讚和信服人民政府，也推動了社會性進步，促進了社會穩定，安定了一方水土，逐漸加快了全面進入小康社會的步伐，也能促使我們的現代化社會早日來到。

尊敬的薄省長，在此，遺憾的告訴您，我們遼陽市政府卻不是這麼做的。特別是對待不景氣企業的下崗職工的做法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請省長大人在瞭解具體事實真相後，給我們一個相應的回覆，以解咱們工人心中的不惑和憂慮。

我們是遼陽鐵合金廠全體職工，本廠原是一個大中型國有企業，所產產品曾暢銷國內外市場，每年給國家創得利稅上千萬元人民幣，職工們的工資也不斷增加，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自從前任廠長、書記范一成上任以來，企業就遭了厄運。他為滿足自己的私欲，排除異己，胡搞亂弄，在原市長、現人大主任龔尙武的指使教唆下，折騰出一個亞礦公司，貪污傾吞廠裏幾億元人民幣。在經營上怠忽職守，廠礦財產跑、冒、滴、漏無人管理，大小蛀蟲明搶暗奪，致使國有資產流失10數億元人民幣，國家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本廠自1995-1999年均為虧損，他們為分貪鉅額獎金卻假報贏利，廠子的財會帳讓他們一夥蛀蟲搞得亂七八糟，一塌糊塗，以各種借貸名義使廠裏的大小親信爪牙摟個溝滿壕平。他們一個個腦滿腸肥，拿國家的財產和工

人的血汗揮霍無度，百無顧忌，至使好端端的一個大中型國有企業消失殆盡。更為嚴重的是，由於范一成在1995-2001年間故意拒交全廠職工的醫療、養老保險，至使廠子破產後廣大工人群眾斷了今後的衣食來源，絕了將來的生存之路。現在我廠被市政府強行破產了，工人同志的生活山窮水盡，淒風苦雨，度日如年。群眾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自1998年到2001年間曾到市-省-京城先後上訪了紀檢委、法院、檢察院、勞動保障部、國務院信訪辦公室等有關部門，控告了范一成一夥腐敗分子的滔天罪行，對福利待遇也進行諮詢。廣大工人們望眼欲穿，至今也沒啥回？

非但如此，現市政府領導人對我們職工所幹的事簡直匪夷所思，令人髮指！總結起來有幾件事如下：

1. 廠礦企業的破產應按《破產法》程式辦理，首先組織職工代表開大會討論通過，要清償職工工資，保證發放養老金、醫療保障金，安排再就業。可市政府卻違背國家法律的規定，幹出令廣大工人群眾極為憤慨的事來。在破產討論投票會召開的前一天，市政府指令市公安局抓走三名工人代表，還有五位工人代表由於群眾、家屬的阻攔抗爭下才未被如願抓走。破產投票討論大會當天，廠門前警員林立，警車橫行，嚴陣以待，如臨大敵。破產領導小組負責人操縱我廠（因特殊情況）不參加破產的工人投贊成破產票，唆使廠工會幹部想方設法讓贊成票超過半數，手段極其卑鄙下流，方法叫人作嘔、唾棄！

2. 對於廠子裏以范一成為首的一夥腐敗分子，市政府卻百般包庇、掩蓋。只是在群眾鬥爭高漲的時候才把范一成關了幾天，說是雙規，春節前范一成已回家，安然無恙，逍遙法外。破產後這夥蛀蟲認為萬事大吉，平安度關，大擺宴席，彈冠相慶。

3. 破產後按國家法律的規定應該向職工發佈一個公文，說明廠財務結算成果，宣佈廠領導人因造成破產所負的法律責任。相反這些都沒能做到，連破產前政府擬文要清欠職工拖欠工資及所承諾的各種福利待遇都不能兌現！他們在破產前連蒙帶騙，好言相勸告訴職工們，只要同意破產，就有優惠條件，好處多多，一經破產後就變了臉，違背承諾，毫無信義，一破了

之！這哪是政府官員的尊容，分明是一副騙子的嘴臉！

4. 破產前就有省市個別領導大插黑手。原省長張國光來遼陽到廠大門前還沒下車，就大放厥詞："這樣的廠子不破產，還等什麼？"率先定了遼鐵破產先音，原市長龔尚武更是遙相呼應，從中幫忙。因為范一成貪污的錢也流入了他們的腰包，怕長期不破產漏了餡，被群眾揭了底！對於職工們反腐敗、求福利的合理、合法要求，現政府領導人爲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坐穩金交椅，蠅營狗苟，隨波逐流。當面好話說盡，背後壞事做絕，先是哄騙敷衍，百般推脫，後是威脅利誘，無情鎮壓，強制執行破產，包庇一夥腐敗分子，把廣大工人群眾推進了火坑，也製造了很大的不安定因素。

5. 現政府領導人，知法犯法，不顧輿論，爲少數人的私利，對上矇騙中央及省政府，對下鎮壓工人群眾。身爲市委副書記、市紀委書記的劉大民在廠反腐敗新聞發佈會上說，腐敗行爲，在國外屢見不鮮，司空見慣，我們改革開放了，腐敗行爲更不是稀奇之事，無足見怪。言外之意，是說搞改革開放應先大搞腐敗，否則會不見成效。這是地道的混蛋邏輯，是和黨中央一貫提倡的反腐倡廉的指示精神大唱反調，徹底違背了江總書記"三個代表"和"七一"講話的指示精神。

我們不禁要問，這位黨的紀委官員說出如此爛調，你的黨性那裏去了，你做爲一個普通人的良心那裏去了。這樣的官僚混子、混蛋、庸才卻做上了我們市的黨委副書記、市紀委書記，真是令人可怕、寒心、憂心忡忡。可想而知我市反腐敗工作能有什麼好結果，真叫人扼腕歎首，嗤之以鼻！

6. 對此種破產程式，我們工人決不答應，決不接受。腐敗分子釀成的苦水讓我們工人飽嘗，我們工人不幹。

本市發生了許多起因政府強制破產，買斷不公的事件，走投無路的工人們紛紛組織遊行、示威，甚至進行臥軌抗議，這樣就給國家造成了重大的政治影響和巨大的經濟損失。對此市里領導人毫不在乎，事出了官照做，大不了狠狠治一治鬧事的人就行啦，賠償又不掏自己腰包。真是混蛋官幹混蛋事，輕而易舉，糊塗官幹混蛋事，手拿把掐！加個橫批-----遲早完

蛋！好了，到此爲止吧，說起這些貪官蛀蟲的罪行罄竹難書，嘮起現市里領導人的行徑令人寒心髮指。被強制破產的廣大工人群眾無法壓住心頭怒火，但又沒啥門路出這口惡氣，如果正式向高中級法院起訴，無奈費用高昂，我們連飯都快要吃不上了，那裏付得起這筆錢。即使能付得起，也未見得能打贏官司。薄省長，我們在被迫無奈之際，想起您這位人民群眾交口稱讚的大清官，盡爲人民做好事、實事的好黨員。望能及早派人來詳細調查瞭解一下我廠破產的實際清況，能爲我們做個主，說句公道話，做個公正的判斷，相信能改變我們目前的悲慘狀況。

我們知道開放以來，由於各種原因，廠礦企業破產，買斷、並軌是大勢所趨，事在必行。但我們廠破產不是因爲市場經濟的衝擊，產品無法銷售或改製造成的，而是一夥罪大惡極的腐敗分子一手造成的。他們相互勾結，上通下聯，狼狽爲奸，侵吞公款數億元人民幣，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破產、破產，一破了之，腐敗分子哈哈笑，廣大工人淚橫流。本市政府這樣強制破產，就是貫徹落實"三個代表"和江總書記"七一"講話的具體行動嗎？我們廠工人反腐敗求福利的行動真的不對嗎？我們沒有這個權利嗎？我們清醒的認識到，爲此而作的一切都沒有錯，按照憲法和相應法律，工人有權利爲自己福利待遇而努力爭取，更有義務幫助黨和國家挖清坑害國家利益吸攝人民血汗的大小蛀蟲，可我們的遭遇和本市政府對廣大工人群眾蠻橫無理的態度讓人費解和難以接受。

我國目前動用警力強行破產的，實在鮮有其例，市政府把事做絕啦！我們廣大工人群眾堅信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府不會幹這種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我們更相信您能關注此事，隨了我們的兩大心願，就是嚴懲范一成爲首的一夥腐敗分子，和得到政府承諾的種種福利以及中央早已規定但市政府沒答應的生活保障金。急切盼望得到一個回覆，打擾您了，爲了全省的大好形勢，望您能關注此事。

最後我們全廠職工祝您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讓我們共同爲建設一個美好的遼寧而努力奮鬥！

遼鐵破產職工

2002年3月5日

國際工會代表團聲援遼陽工人

中國勞工通訊曾經報道過，今年四月，總部設在法國，其成員遍佈世界一百多個國家的國際勞工團結聯合會(ILC)和中國勞工通訊，發起了聲援中國遼陽工人，要求釋放姚福信等四名被捕的工人代表的簽名運動（請進入這個網址看國際勞工團結聯合會的公開呼籲：<http://big5.china-labour.org.hk/big5/article.asp?articleid=2351>）。這個運動得到國際工人運動的廣泛支持。數十個國家的上百個工會，數千名世界各國的工會負責人及成員，特別是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工會負責人和成員簽了名，並發出了聲援信。

四月底，國際勞工團結聯合會的代表拜訪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法國大使館，向中國政府要求釋放被捕

的工人代表，表達了對遼陽工人命運的關注。中國駐法大使館沒有一如以往地粗暴拒絕，反而是禮貌地接下了呼籲書，並表示向中國政府轉達他們要求的同時，會和國際工人運動保持聯聯。

五月，爲了向中國當局，特別是向遼陽市政府直接表達釋放被捕工人代表的要求，並將國際的支持聲音直接傳達給遼陽工人，國際勞工團結聯合會組織了由讓-皮耶爾-巴華爾(Mr. Jean Pierre Barrois)爲首，和兩名法國工人力量總工會(FO)成員及兩名法國工人總工會(CGT)成員組成的國際工會聲援遼陽工人代表團。五月二十六日，該團的五名成員在遼陽被中國公安人員拘留。以下是該代表團爲此發表的聲明。

國際工會聲援遼陽工人代表團聲明

今天，五月二十六日，我們被遼陽公安人員拘留。

我們（國際工會聲援遼陽工人代表團）代表二十三個國家的數千名工會會員來到中國，以表達全世界勞工對中國兄弟的支持。我們沒有任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國人民的敵意行爲。我們來到這裏是要對遼陽的工人們說：你們要求發還被拖欠的工資，要求失業救濟金的抗爭，是世界工人抗爭的一部分，是工人階級傳統的、慣常的抗爭方式。

國際勞工團結聯合會和中國勞工通訊曾發出了要求釋放遼陽被捕工人的呼籲書，全世界數千名工會積極分子在這個呼籲書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表達了他們對遼陽抗爭的工人及其家屬的關心和支持。我們帶著這個呼籲書的中文版本和來自全世界的數千個簽名來到遼陽，卻被公安人員拘留。我們向公安人員作了解釋，和要求會見當地政府的代表，要求去監獄，以表達釋放被捕近兩個月的工人代表的期望。但，我們的要求被拒絕。遼陽當局強迫我們離開遼陽，並用公

安局的麵包車將我們押到離遼陽100公里外的瀋陽。

我們提出，明天，即五月二十七日，希望能會見遼寧省政府有關負責人，以表達釋放被捕的工人代表的要求。遼寧省公安廳的負責人對此的回應是，明天早上十點，他將告訴我們和遼寧省政府有關負責人聯繫的方法。我們也告訴這位公安廳負責人，如果明天上午十點正我們得不到答覆，我們會自行到省政府。

今天，我們要告訴遼寧省及全中國所有工人和農民：請你們相信，全世界的勞工正支持你們；我們一定會讓世界各個工會組織，各工廠企業都知道和瞭解你們的合法要求及抗爭。

今天，中國有關當局以一切手段來制止我們表達釋放被捕工人代表的要求；但，他們不能阻止中國人民爲爭取享有獨立組織的權利、享有民主自由的權利而進行的抗爭！

對一人的迫害就是對所有人的迫害！

國際工會聲援遼陽工人代表團

2002年5月26日北京時間20時45分於瀋陽

中東危機剖析

斯蒂德

布殊以空洞的言辭談論中東需要和平和公正。而他那一伙五角大樓的人卻在草擬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計劃。

布殊發動的「對恐怖主義進行戰爭」，使那個地區的千百萬人民每天都生活在美國轟炸和經濟封鎖之中，而且生活在野蠻的和腐敗的本國統治階級之下。

中東危機的中心問題，是得到美國支持的以色列強加於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自巴勒斯坦人民起義以來的18個月中，以色列的暴行和造成的損失已經達到十分嚴重的程度。巴勒斯坦地區和中東的不穩定，是西方強國干涉的直接結果。

1882年，英國軍隊佔領埃及，由此開始了英法兩國在這一地區劃分勢力範圍的歷史。這是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世界的一部份。

20世紀初，在中東發現了石油和天然氣這一被譽為「歷史性的最大價值」，使得這一地區具有了戰略上的重要性。

西方強國，特別是今天的美國，依靠百依百順的本地的統治集團和實行定期的軍事干涉來保衛它在這一地區的投資。但它們愈來愈遭到巴勒斯坦地區和整個中東的激進伊斯蘭政治運動的反對。

以色列

以色列是得到美國和英國認可的在1948年建立起來的國家。它是美國的看門狗，用它的軍事力量來控制阿拉伯國家。

創建以色列國的思想體系是猶太復國主義。它發展成為民族主義的政治運動，要求猶太人要有自己的國家。它認為非猶太人都是天生的反猶主義者。

1945年後，美國和英國支持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猶太復國主義的國家。部份原因是它們都不願意接納由戰爭造成的百萬猶太人難民。

猶太復國主義者堅持說，巴勒斯坦地區是一塊「沒有人民的土地，應當給予沒有土地的人民」。這一論調無視這一事實，即當時該地區居住著63萬猶太

人和130萬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是被逐出自己的家園的。他們變成了難民，或者在自己的土地上成為二等公民。

巴勒斯坦地區有475個村莊，385個已完全被毀。最慘烈的屠殺發生在戴爾·雅辛，整個村莊300人口全部被殺光。

今天的巴勒斯坦人一直在被佔領之下度日。他們每天都受到以色列的武裝力量和居住在佔領區內的全副武裝的猶太移民在軍事上和經濟的刁難。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生活在貧窮污穢的貧民窟裡，沒有清潔的飲水，而猶太移民則居住在現代化住宅中，有花壇，有游泳池。

在世界上，以色列算得上是有力量的軍事強國，是用美國F16噴氣式飛機、直升機、戰艦和Mortava坦克等武裝到了牙齒的。這就是巴勒斯坦人為爭得自由和返回自己居住上千年的家園的權利所面對的鎮壓力量。

伊斯蘭

在中東，激進伊斯蘭是反對美帝國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最重要的意識形態。西方把伊斯蘭描寫成「原教旨主義」，而事實上它是在一百年前即已開始的反對歐洲殖民主義的運動。這個運動是由中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領導的。他們要求改變依附於帝國主義的現存腐敗政權而求得獨立。

前斯大林主義的共產黨不倚靠當地的工人階級，對民族主義者採取不加批判的支持。當民族主義者取得政權時，如著名的納賽爾將軍在埃及的統治，他們便立即背叛了大多數平民老百姓。

在民族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夢幻破滅之後，多數人民便轉向伊斯蘭。

在巴勒斯坦，貧困不堪的人民得到伊斯蘭教徒的關懷和服務，這是真實的。這使他們的名聲大噪。對大多數的巴勒斯坦的人民來說，伊斯蘭集團如哈瑪斯和伊斯蘭聖戰組織，祇是反對佔領勢力的組織吧了。

這種認識在整個地區的千百萬人民中是很普遍的。因為人民在西方帝國主義和暴虐的地方政權的股掌之中吃盡了苦頭。

激進伊斯蘭把西方帝國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視為敵人，僅僅認為這個敵人應改變自己在中東地區的錯誤戰略。激進伊斯蘭讓群眾的憤怒和悲痛得到發洩，而同時加以限制，從而引導它遠離真正的鬥爭目標。激進伊斯蘭常常是由享有特權的集團來領導，為群眾在宗教信仰的基礎上的聯合進行辯解。這些領導集團要求更換現存的統治者，而不要進行根本的社會變革。從嚴酷的伊斯蘭政權，如伊朗、阿富汗的經驗中可以看出一般老百姓在伊斯蘭的變革戰略中得到的是何等微小。伊斯蘭教徒有時雖然也發動群眾，但他們的策略通常是挑選少數人採取軍事行動，進行自殺性的爆炸和謀殺。這對帝國主義不能造成真正的威脅，還會妨礙群眾鬥爭可能引起的真正變革。

和平進程？

當伊斯蘭的解放鬥爭陷於僵局之時，由西方領導人和媒體推動的所謂中東和平進程也解決不了問題。

西方的解決辦法是：以聯合國關於巴勒斯坦的242號決議為基礎，實行兩國分治，即一個是猶太人的國家，另一個是阿拉伯人的國家。在1967年六日戰爭之後，以色列野蠻佔領了東耶路撒冷、西岸和加沙地帶，巴解組織的領導阿拉法特、法赫塔也開始支

持兩國分治。

巴勒斯坦的知識份子愛德華·薩以德指出：從最好的方面來說，所謂和平進程祇是簡單地承認現有的佔領狀態的談判。除了結束佔領和把土地歸還巴勒斯坦人民，這裡是不會有和平的。

巴勒斯坦必需是民主的非宗教的，在那裡的人民才能有平等的生活。

變革的力量

就巴勒斯坦人民自己而言，他們沒有能力戰勝以色列強大的軍事力量。但他們英勇的鬥爭贏得了埃及、敘利亞、黎巴嫩、約旦、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中東國家的工人階級的廣泛支持。美國副總統迪克·切尼最近訪問埃及和約旦，群眾舉行了大規模的抗議示威，要求這些國家同以色列和美國斷絕關係。工人階級的支持需要採取一系列戰略，以避免重蹈斯大林主義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失敗的覆轍。去年在貝魯特召開的同世貿組織卡塔爾會議相對抗的集會表明了反對資本主義的政策是唯一可行的選擇。

同強有力的阿拉伯工人階級的行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政策，不僅對美國和以色列，而且對否認人民的經濟和政治權利的本國統治者，能夠提出真正的挑戰。

（蔚然摘譯自2002年3月29日《社會主義工人報》）

中東的怒濤

亞沙夫

3月29日，星期五，阿拉伯世界變了。以色列總理沙龍派遣部隊對巴勒斯坦進行非常嚴重的突然襲擊，用坦克包圍了阿拉法特的官邸，並在拉瑪拉、杰寧、納普魯斯和整個約旦河西岸地區許多城鎮和村莊實行大屠殺。

走投無路的阿拉法特，通過衛星廣播電台對阿拉伯世界講話說：「我將作為烈士死去。為了耶路撒

冷，我們要有上百萬的殉道者。」就在阿拉法特的講話重覆播放的當天，許多巴勒斯坦人的活偶像在街上被殺害了。在隨後的十多天裡，整個中東地區，從約旦到摩洛哥，也門到黎巴嫩，乃至科威特，都爆發了群眾的抗議示威。

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群眾要到正在舉行貿易會議的聯合國大樓去舉行抗議。在一個鐘頭之內便集合

了數百人，他們擠開警察的阻撓逕直向中央區走去。一個半鐘頭之後，一隊又一隊的抗議遊行出現了。難民們從營地裡走出來，匯合了來自科學殿堂的大學學生們，有節拍地高呼：「爲了耶路撒冷，我們甘當百萬烈士！」

在埃及開羅，學生們在所有校園裡召開群眾大會，打算到街上去遊行示威，但被制止了。約旦的學生們試圖到街上去，也被推回去了。但，一天之後，兩個國家的學生們經過整天同保安部隊的辯論，他們勝利了。在沙特阿拉伯，任何形式的抗議都被禁止，人們便驅車到靠近卡塔爾的地區去舉行抗議示威。巴林是美國的重要盟國，又是美國第五艦隊的基地；美國大使要學生們爲自殺性爆炸身亡的以色列人默哀一分鐘，學生們勃然大怒予以反對；在周末，一名學生被橡皮彈射殺身亡；美國大使館起火；抗議遍及了整個國家。埃及的亞歷山大港，數千學生試圖在石油董事會開會的地點遊行示威，警察無法控制，用鳥槍射擊，打死了一名學生，是畫家的兒子；數百人受傷，60多人被捕。這樣一來，抗議示威者改變了呼喊口號，對現政權直接提出批評：「穆巴拉克是懦夫，是美國的代理人。」「我們要新政府。我們受害已到了極點！」

4月1日，星期一，以色列把200名巴勒斯坦人圍困在伯利恆聖誕教堂裡，周圍用火薰煙。教皇譴責以色列這種暴行。第二天，所有黎巴嫩的天主教學校全部罷課。什葉派伊斯蘭的積極份子和法語基督教學校的學生舉行了抗議示威遊行。中學生開會發動罷課，他們串連各校學生舉行遊行，在漢堡包王飯店門前靜坐示威。在巴林，學生們洗劫了麥當勞麵包店。在埃及，一家肯德基燒雞店被燒毀。在敘利亞，非官方的遊行示威一開始便與可惡的秘密警察發生衝突，學生們在返回學校的路上唱著歌和呼喊口號。

據官方統計數字可以知道抗議示威的規模，雖然這些統計數字並不完全。數字如下：也門有10萬人參加抗議示威，摩洛哥連續數天的抗議有150萬人，敘利亞1萬人，黎巴嫩10萬人（南部城市西頓參加遊行示威的竟有該市一半的居民），蘇丹超過100萬，埃及有10萬人，科威特2萬人，最先發生抗議示威的沙特阿拉伯，有2000人在石油首都達蘭舉行遊行示威，對現政權明白表示群眾的憤懣；在沙龍發動進攻

前夕的一項民意測驗中，問到爲什麼要憎恨美國？75%的人回答說：「因爲美國支持以色列。」

批評政府

阿拉伯國家的外長們在開羅發表了一項強硬反對沙龍的宣言，但卻沒有行動；沒有人重視這一舉措。甚至在現政府裡，批評也變得直言不諱。一位受人尊敬的約旦前法官穆罕默德·奈米傷心地公開說：「我們希望外交部長們採取實際步驟，同以色列斷絕關係；使用石油作爲武器——甚至作爲有威脅的武器來對付美國。」「爲什麼政府不願這樣做？」一位埃及青年講得更爲簡潔明了，他說：「阿拉伯各國政府必需明白，你們須得改變政策。政府不聽人民的話，人民就有權推翻它。」

穆巴拉克發表電視講話，要求美國政府盡最大的努力和所有外交手段來控制以色列。但美國明顯不願意制止以色列的屠殺。阿拉伯國家政府也沒有能力制止以色列的侵略。因此，抗議者的要求開始集中在石油問題上。「停止供應石油！」和譴責阿拉伯國王和獨裁者的呼聲便在整個中東地區回盪。伊朗強硬派精神領袖霍梅尼曾以典型的修辭宣佈：「石油屬於人民，也是反對西方的武器。」但他從不作出承諾。當伊拉克停止供應石油時，其他國家卻急急忙忙增加石油生產。極端的和保守的阿拉伯國家政府這種做法都被證明是欺詐行爲；抗議示威者並沒有忘記這個教訓。貝魯特有一塊橫幅寫道：「伊朗和黎巴嫩爲何還不停止供應石油？」

各中東國家的政府陷入了一片驚慌失措之中，紛紛打電話到白宮請求布殊採取行動。在黎巴嫩，政治家們和執政黨決定舉行官方的抗議示威遊行來抑制群眾的激憤。整個地區的阿拉伯統治者都以強硬的詞句譴責以色列和美國，但他們卻以國家的武裝力量來對付抗議示威的群眾。一間學校的2000名學生遭到催淚瓦斯的襲擊，約500人被送進醫院搶救。在約旦，蘭尼亞皇后領導一次官方的遊行示威。第二天，幾千名武裝部隊湧上街頭，組織者祇好取消這次作爲最大規模的抗議示威的安排。在一次激憤的會議上，官方組織者遭到了譴責。一位青年積極份子喊道：「你和政府去睡覺去吧，我們的抗議示威運動不需要你來組織。我們會取得勝利。」

抗議示威運動正處在十字路口。阿拉伯各國政權決心要粉碎它。但無論如何，群眾從中仍學到了重要的一課。抗議示威是自發的，常常從學校和大學開始。在埃及和黎巴嫩，左派在抗議示威運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一位埃及安全部門的官員譴責激烈的抗議示威運動，認為是「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份子所為……，沒有宗教色彩。宗教團體是很洒脫的，它們知道不能跨越界限。」在埃及，穆斯林兄弟會通常組織的抗議示威是得到警察非正式允許的，祇能在一定的範圍內進行。但這個範圍總被打破。新左派總結他們的經驗，一位青年積極份子說：「去耶路撒冷的路要經過開羅。」

在約旦、沙特阿拉伯和巴林，伊斯蘭反對派充當過領導的角色，但抗議示威運動的性質證明了他們因為受到來自下層的壓力才這樣做的。在約旦，伊斯蘭反對派失去控制運動的能力、和惹怒青年人，是因為它取消抗議示威運動。

國際團結在抗議示威運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反資本主義和反對全球化的積極份子團結一致支持阿拉法特的聯合組織。他們被抗議示威者視為英雄。阿

拉伯民族主義者和伊斯蘭教徒做不到的，左派和青年人便擔當起來。這使阿拉伯世界開始了新的紀元。

在中東各國人民掀起反對以色列和美國如火如荼的抗議示威怒濤的同時，西方各國成千上萬的人民也走上街頭舉行抗議示威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鬥爭。在希臘，引人注目的建築工人以團結一致的姿態到以色列大使館去抗議。在巴塞羅那，有1萬人在大雨滂沱中舉行示威遊行。巴黎有2萬人，倫敦兩星期來有10萬人，阿姆斯特丹有3萬人，在美國舊金山有2.5萬人，等等，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抗議示威浪潮。正是在全世界人民一片抗議聲中，美國不得不改變它一貫支持以色列迫害巴勒斯坦人民、以維護它在中東的利益的政策。殘暴的以色列統治者沙龍也不得不釋放被他囚禁的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但，即使美國和以色列明目張膽的侵略行為有所收斂，他們的侵略野心是不會改變的。因此，中東人民反對美國和以色列的鬥爭並沒有結束；祇要美國的艦隊還在波斯灣，在阿拉伯海，在紅海遊弋，整個中東地區就不會有太平。

（蔚然摘譯自《社會主義評論》2002年5月號）

以色列境內的計時炸彈——巴裔公民

康涅—帕納斯

〔接受訪問者蒂克娃·康涅—帕納斯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出版的雜誌《界線之間》的合作編輯；訪問者是丹尼爾·伯格。這是為一份德國社會主義雜誌《前進》而做的訪問〕

問：以色列現時向巴勒斯坦的進攻，是什麼目的？

答：以色列軍現時殘暴的軍事攻勢，是要對巴勒斯坦人民的起義運動進行漫長的殲滅戰，這個殲滅戰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它的目的，就是要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把巴勒斯坦人殲滅殆盡」。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這個戰略性目的，是和美帝國主義的利益相合；後

者是要把中東任何獨立的民族主義政體或獨立的政治運動全部消滅，因為它們妨礙了美國在中東推行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計劃。

「和平進程」結束

由以色列工黨開創和執行的以巴奧斯陸協議，原意是代表以色列的資產階級，來達成中東地區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計劃。不過，以色列軍在兩週前開始的攻勢，標誌了這個協議進程的結束。

本來，奧斯陸協議仿效南非種族隔離時代的「班圖斯坦分治計劃」而實行的方案，原來的設想，是由

以阿拉法特為基礎而組成的「巴勒斯坦政府」來動手，壓榨任何反對這個方案的力量，從而達致瓦解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運動，使巴勒斯坦人像庫爾德族人一樣，被分散統治。但以色列的這個設想是大錯特錯了。民間起義力量平地一聲雷的異軍突起，正就是拒絕擔當被指定的角色而爆發。它標誌著在過去七年來沉睡的民族力量的甦醒。過去七年來，也即是根據奧斯陸協議，整個在1967年被佔領的區域全部被分散切碎，由以色列殖民區和道路系統切開。民間起義運動包含了得到全民支持的政治組織；它的起義，就是要撕破奧斯陸協議的遮掩，披露巴勒斯坦繼續被以色列佔領的真面目。全體民眾在民間的政治領導層的領導下，返回起義的道路來了。

以色列就是向這個全民起義進攻，它向巴勒斯坦全民及這個民族全面開戰，而且也決定把阿拉法特結果掉。

在這個後奧斯陸協議的時代，以色列恢復了進行直接的殖民統治；只不過，它狡猾地用了這個借口：「收回對地區A的保安責任」（因為佔領了西岸82%土地的地區B和C，已經是處在以色列保安控制之下）。換言之，就是讓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大力箝制下，自管死活，找法子解決自己的日常生活必需。

問：以色列政府的長遠政策，是否向大多數巴勒斯坦民眾施加壓力，強迫他們「離國」？

答：銳意把巴勒斯坦人鬧得雞犬不寧，迫使他們投降或離國，這已經是工黨及之前的政府的政策。只不過，沙龍政府這個大規模驅逐民眾的計劃，之前並沒有宣諸於口，沒有公開表示過。直至兩年前，當這個意圖宣示出來，還是會被認為過份野蠻，只能得到少數人同意。但現在氣候有了變化，而軍人進入以色列政府的「保安內閣」，更促進了這方面的公開化。在以色列的新聞媒介和學術研究界，把巴勒斯坦人「送走」的題目，現在已經可以名正言順地提出來了。這個討論，甚至也包括論及把以色列國內的巴勒斯坦裔公民送走；因為，巴裔的以色列公民的民族認同感，在近期已經迅速投向在1967年佔領區內進行民族起義的兄弟了。而且，他們對以色列政府也提出了大不同於昔日的政治要求。在過去，他們只要求在公民權利上，與猶太裔以色列人享有平等的公民權；現在，

他們受了「國民民主陣線運動」的啟發，向以色列國挑戰，提出要求被承認作為巴勒斯坦少數民族的身份，以此來爭取在以色列國內享有集體權利。

巴裔以色列人挑戰以色列國

據以色列的自我界定，它是一個「猶太國」。以色列國幾乎全體民眾，包括所謂的「左派」，皆視這一點為復國主義的基本定義。所以，巴裔以色列人要求以色列承認他們是以色列國內巴勒斯坦少數民族的身份，不啻就是對這個界定作出實在的挑戰。還有，對「猶太國」的定義，也是包含了境內猶太人的多寡數量的，所以，必須維持猶太人佔人口的多數，才能使以色列國的「猶太人身份」屹立不倒。由於有這個基本的想法，所以注定會使以色列國的追隨著，包括真心實意地支持以巴兩國分立的「左派」，贊成運用各種政策來抑制以國內的巴裔人口，包括最終不可避免地要用迫使他們離開的「種族清洗」的方法。

問：在以色列，有沒有另類的力量可以爭取，作為長遠政策的同盟？

答：目前，以色列境內的猶太人中，並沒有這個政治力量，能夠領導鬥爭，反對美——以的殖民主義計劃。以色列全部的猶太人政治組織，俱代表著從歐洲移民過來的資產階級的利益；這一支資產階級的霸權，從來未曾受到大挑戰。新自由派不論「左」右俱沒有區別——而且，正是以色列工黨，領導了推行奧斯陸的協議。猶太復國主義包含的建立猶太國的思想，是這個主義的中心思想，也是以色列的霸權思想的根本構成，證明是一個成功的工具，把猶太人民聯合起來，甚至也把工人階級聯合進來，一直支持持續進行的猶太復國主義的殖民地計劃。

以色列的工人階級是按民族和種族而分化。源於中東巴勒斯坦本地的猶太人，他們是和巴裔以色列人一道，組成無產階級的大多數，居於最底層。他們沒有任何獨立的政治組織，能表述他們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受的壓迫。整個工人階級甚至沒有工會，不能為起碼的權利鬥爭。

問：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公民發揮著什麼角色？在爭取另類的出路上，他們是否具有重要性？

以色列腹背受敵

答：以國的巴裔公民備受著民族和階級的雙重壓迫；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所指派的「新中東」裡，沒有他們的位置。現在，受到以色列國會成員卑沙拉領導下的「國民主義議會黨」的啓迪，他們成為了以色列政局中唯一一個真正的民主力量，對猶太復國主義國提出嚴重的挑戰。他們正日漸從爭取「平等公民權」發展為爭取「少數民族享有集體權利」。這個要求，否定了猶太國最根本的基礎。在2000年10月，巴裔以色列人英勇示威而有13人被軍警殺死之後，以色列前總理巴拉克在一次政治辯論中，說得很清楚：「我們作為一個猶太國家，可以同意阿拉伯人有平等的個人權利，這些權利不會侵害民主的猶太復國主義國家。可是，猶太國不能接受在它的內部為其他民族的集體身份作出界定。那種渴望的長遠目標，是極端份子設想的『所有公民的國家』。」

屬於1948年確立的巴勒斯坦民族身份的民族認同感，及他們對1967年佔領區內的兄弟姊妹的起義有愈來愈多的同情支援，無疑是會對作為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體現的猶太國構成威脅。多年以來，巴勒斯坦問題只是按1967年的佔領區來作為問題而界定，而且據稱可以用兩國的分立來解決。至於在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人之被分割出來、歸於邊緣化這一點，一向就被當作是相安無事。直至巴裔公民在上一次杯葛以色列大選，及他們在過去18個月來的表現，才使人如夢驚醒。

聯合國在1947年關於分割巴勒斯坦土地的決定，是假設了巴人的民族解放運動能夠輕易的被粉碎。這個假設是錯了。結果，在以色列立國50年之後，我們又再次看到，帝國主義和復國主義還是要面對老問題：分散各地、包括在以國境內的巴勒斯坦人民，全體聯合起義，將會把整個中東地區裡的阿拉伯世界內的受壓迫人民震動起來。

巴裔人在以色列內部展開第二條戰線，反對以色列在整個巴勒斯坦土地上實行復國主義的種族隔離統治；這條戰線的重要性，可能不下於巴勒斯坦人在1967年佔領區內進行鬥爭的重要性。

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義

所以，我的結論是，反復國主義的猶太人國際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應該支持以色列巴裔人的真正的民族主義潮流。這個民族主義的成員無疑不是投身階級政治，也不是爭取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實行社會主義。然而，真正的國際主義者，應該用唯一鑑證的標準來支持他們的民族主義，那便是：他們是否向帝國主義挑戰。

由以國巴裔人領導的，向猶太復國主義的國家性質作出的日常鬥爭，和1967年佔領區內的巴勒斯坦人解放鬥爭一樣，同時都是反對中東地區上的美帝國主義。所以，加入他們的行列，並且，在以色列激進猶太人圈子決定議程的問題上，接受巴勒斯坦人的領導，是國際主義者們面對的至為進步的民主工作。

（史丹摘譯自《國際觀點》2002年5月號）



為第三世界的和平、全球正義和團結而奮鬥

——記第二屆亞太國際團結會議

仲明

反全球化引發的反思

早於去年九一一事件之前，世界經濟已是不怎麼“繁榮”，而背後隱藏的問題與危機早已是不單只反全球化力量才看得到。全球資本主義不穩定、金融危機爆發的勢頭，不斷威脅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

在全球的範圍內，貧困與不安全問題正在上升，世界絕對貧困人口已經從7、8年前的10億增加到現在的12億，所有第三世界的貧困率與收入不平等都在增加。世界銀行、基金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提供的數據顯示，工業化國家與30多個最窮國家的人均收入相差至少74倍，世界上最富有的三個人的財富超過60個窮國國民生產總值的總和。

在這樣的背景下，第二屆亞太區國際團結會議在雪梨市召開，會期由3月29日至4月1日。合共有30個國家或地區的政黨成員和政治活躍份子出席該次會議。會議的主題是：「為第三世界的和平、全球正義和團結而奮鬥」。

登記出席會議的人數超過750人，當中主要來自澳洲各地的左派政治團體的成員，特別是社會主義聯盟屬下的7個政黨和政治團體。

其他國家的，則主要是來自亞洲，如東亞的南韓、西亞的土耳其、南亞的印度、東南亞多個國家等。其他的計有北美洲、南美洲、非洲、歐洲、以至北歐地區等。

在4天的會議中，合共舉行16場主題研討，另外還舉行了超過100個專題工作坊。

部份主題研討是關於個別國家的鬥爭。例如：南非的多名代表分別就「從解放到後自由主義？南非群眾運動迷失了方向嗎？」作深入的闡述。而巴基斯坦的數名左翼政黨代表則就「巴國左翼為和平和正義的鬥爭」發言，陳述他們在「反恐戰爭」籠罩下的艱苦經歷。另外，亦有阿富汗革命婦女組織的代表報告在塔利班政權統治下的婦女狀況，以及現時所面臨的挑戰等。

當然，大部份主題研討均與「九一一」事件後的世界局勢、反全球化（或稱全球正義運動）、反戰爭

等有關。

新的世界矛盾正在反全球化運動中孕育。這個全球矛盾其實不是別的，根本上仍然是窮人與富人的對立。但這個矛盾的各種表現形式，諸如社會抗議、貿易爭端、民族沖突、宗教對立等，在全球化加速的情況下，未來世界的沖突主要表現為資本的統治、技術的統治與少數集團、少數國家的統治，亦即在全球民主欠奉的全球性統治。由此看來，新的世界矛盾與沖突自然不可避免。反全球化運動正好說明與預示這一點。全球化為未來世界帶來新的沖突與戰爭，包括世界範圍的沖突與戰爭。

在台上發言及台下討論期間，均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反全球化是指什麼？

全球化與反全球化恰似銀幣的兩面，如同全球化概念的模糊性一樣，反全球化對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理解的概念。它可以指對全球化的否定，對跨國公司、自由貿易、科技創新與國際經濟體系全球擴張的擔心，對全球化代表的新階段資本主義的反擊，對全球化加劇的貧富鴻溝、社會分裂、環境災難的不滿等等，不一而足。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可說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當前的反全球化示威與論點涉及許多方面，但歸納起來，大多數人最集中關注的兩大問題是全球正義與生態環境的持續發展。

有論者指出，資本的全球化當然是問題所在，但左翼運動中正要鼓吹的是全球工人大團結、外來勞工的權利、開放邊界、停止囚禁船民或難民等等。因此，有論者認為與國際資本的鬥爭應稱為「全球正義運動」，以包容形式多變的工人階級和群眾運動的反抗鬥爭。

大會並沒有就這問題下結論。但這個範圍的討論可以從多角度檢視，使各地的左翼運動得以更深入討論「全球化」下的抗爭內容和動力。

另一個引起一定關注的討論是鬆散的「反全球化」運動下的動力問題。反全球化已經成為一場“全球運動”。近年來，全球範圍的反全球化運動不斷，一些重要的全球會議已經接連不斷成為示威者所稱的全球行動日。十分有趣的是，反全球化運動本身

已經全球化了。反全球化運動的組成人士來自全球各地的聯合會與工會、環保組織等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組織，有土著、社會主義者、性別平等主義者、甚至無政府主義者，他們爲了共同的反全球化目標而走到一起。

除了上述大規模的街頭示威外，網絡上的反全球化運動更加活躍。反全球化者通過網絡空間研究與討論全球化問題，在網絡中廣泛表達對社會公正與環境惡化的關注，協調全球反全球化行動，不一而足。反全球化的著名網站很多，例如《摧毀IMF》、《跨國公司監控》、《全球人民行動反對自由貿易與WTO》（Peoples' Global Action against "Free" Trade and the WTO）、《社會主義選擇》（Socialist Alternative）；至於像國際綠色和平（Green Peace International）、世界自然基金（World Wildlife Fund, WWF）等環境保護組織都設有影響廣泛的網站。從九九年西雅圖開始的抗爭，一直至本年初在巴西榆城舉行的「全球社會論壇」，均凸顯一種情況，有人稱之「全球非官方組織的嘉年華」，亦有人說「反全球化」運動好像正走上全球非官方組織組成聯合工會的道路。筆者相信，左翼政黨如何在這種運動中自處當然是極爲重要的問題。國際資本的領導人尙且一年數次碰頭，那麼，這場自60年代末以來的最大規模的反資本主義運動的領導又在那裡呢？這倒是任何一個參與其中的左翼政黨需要努力奮鬥的方向。

國際主義行動

大會的進程也不是單口水花四濺的。3月31日早上，大會聯同社會主義聯盟主催一次抗議行動，前往雪梨市西面一個船民拘留中心，抗議澳洲政府的難民政策。爲數超過500人的隊伍首先在附近的火車站旁集合，大張旗鼓，手持一個氣球，在一部開篷拖架的帶領下，浩浩蕩蕩向拘留中心進發。行程大約20分鐘，途中更行經一段高速公路，但沿途所見，除了兩部警車、兩名騎單車的警員外，便沒有其他執法人員了。與香港警方在遊行時如臨大敵的做法頗不相同。事實上，在拘留中心鐵欄外就是民居，街道對面的居民還走出來看熱鬧。若論「擾亂公眾安寧」，那數百人的口號聲、歌聲、演講聲，肯定不見容於香港的公安條例。更難以置信的是，當地的執法人員竟然讓示威者爬過圍欄，把帶來的氣球縛在鐵絲網上。

這個拘留中心位置在市內，情況不算特別惡劣。另外有些是在內陸的沙漠地帶，那兒才真正算是沙深火熱。在大會舉行期間，就有數百示威者駕長途車到

那裡扎營，期間更推倒鐵絲網，讓數十名船民逃了出來。整件事成了國際新聞。

示威群眾的國際主義精神令人佩服，他們的口號是：開放邊境、關閉拘留中心、全面協助船民等等。這些主張都與澳洲主流社會的意識完全相反，但他們還是要爲船民的權利奔走。

當天下午的主題研討之一正是：「毀掉那些堡壘！難民和移民的自由要全球化」。與會的一名美國代表講述美國政府在九一一事件後實施跡近戰爭時期的措施。數以千計的阿拉伯裔人被扣留調查。期間進行所謂的民族背景審查，更多的人被限制離開本州，有些人則被僱主藉機解僱。那位講者沉痛地指出：所有入境管制都是種族歧視的。我們要的是工人階級的全球化。

回看香港，情況更加惡劣，同文同種的港人在內地所生的子女，也要一律遣返，製造更多的人間悲劇。政府輸了官司，還要來一招人大釋法，令這些悲劇不知要延續到何時。

4月1日早上，從新聞報道得知，阿拉法主席被以軍圍困在辦公室內，情況甚爲不妙。大會在得知情況後，臨時徵求數名各地的代表組成代表團，到雪梨市中心的以色列大使館，聲援在那裡舉行集會的巴勒斯坦群眾。就這樣，與南韓、印度、巴基斯坦、南非的代表匆匆乘車到達，只見過千民主人士在使館樓下街道集結，情緒相當激憤。雖然他們在鬧市的街道中佔用了一條行車線集會，但當地警方只派了很少的人員在現場維持秩序而已。我們在那裡拉開橫額，而南非的代表代表大會向群眾致意、譴責以軍、聲援巴人繼續鬥爭下去。

大會決議

大會的另一部份是專題工作坊，共有超過100個，筆者根本分身乏術，只能出席數個。來去匆匆，自然很難說深入認識各地的鬥爭。整體來說，這些工作坊爲參加者提供各大洲的工人運動、群眾動員、組織狀況、動員策略等資訊，爲下一步開展工作、經驗交流、建構國際網絡等起著一定的作用。

最後，大會通過四項決議：

- 一、響應全球社會論壇的動員號召；
- 二、宣佈支持在印度召開2004年全球社會論壇；
- 三、於一年內在馬尼拉召開一次亞太地區的社會論壇；
- 四、號召亞太地區在4月19日舉行聲援巴勒斯坦的行動。

義大利3百萬人上街

丹熱尼

在2002年3月23日，在羅馬街頭出現了義大利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群眾示威。在當天，3百萬個工人、學生、退休者和移民，走到羅馬街頭示威，反對貝魯斯康尼政府企圖向工人進攻，改變在第二次大戰後工人爭取得來的勞工和社會福利。示威的主題，就是反對所謂「改革」勞工立法。這次示威是由前義大利共產黨、現在的社會黨領導下的總工會（CGIL）號召，組織者對當日出現的人數也大感意外。

這次大規模群眾示威，反映了義大利日益尖銳的社會衝突。就在舉行大示威的前三天，修改勞工立法第18條（原為必須重新聘用被無理解僱的工人）的起草人被暗殺死亡，政府趁機使用恐怖手段，向工會及整個運動發動攻勢。30年前一度活躍的城市游擊組織「紅色縱隊」宣稱是該次暗殺行動的主事者。貝魯斯康尼政府意欲向第二次大戰後確立下來的社會和民主架構全面改組，觸動全國勞工契約及工人向來享有的退休、醫療和公共教育的權利，以及各項勞工權利，包括免受無理解僱的權利。總工會的反應是強烈反對

政府的意向，除了發動這次示威，更號召在4月5日舉行總罷工。這個決心，也激化了其他溫和及中間派工會，拒絕與政府及僱主公會作有關商討，使社會上產生一條全面反政府的陣線。

從去年7月熱那亞市出現反對「七大工業集團」高峰會議的示威開始，從下層興起的政治活動，終於蔓延到工會組織，並且由工會在 frontline 領先。

繼2002年3月23日的歷史性大示威，義大利工人在4月16日響應3個全國主要工會的號召，停止工作一天，走上街頭，示威反對現任政府推行的反社會政策。這次大罷工動員了1.3千萬工人參加，據工會所述，全國有90%工人響應了號召，創下了20年來最大規模的全國總罷工。

爭取全球公義的運動也支持工人，在當天發起行動。他們佔領了一些職業招聘社的臨時辦公室、大學和學院，以顯示把「總罷工推向全球化」的思想。

（史丹節譯自《國際觀點》2002年4月、5月號）

全國總罷工震顫了意大利老闆們

路西

4月16日，意大利發生了近20年來未曾有過的全國性大罷工。罷工的多是反對意大利貝盧斯科尼的右翼政府決定修改1970年施行的意大利勞工法18條。修改後的勞工法將使老闆們有權隨意解僱工人，和用臨時工取代原來的工人。這次罷工的衝擊力是非常大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關於修改勞工法的消息原是嚴密封鎖的。所有的報紙、廣播電台的記者們，包括貝盧斯科尼掌管的四家國家電視台的記者們，全都不

知情，了無聲息。但，「於無聲處聽驚雷」，此話卻是意味深長的。

祇是在後來的日子裡，罷工的準確規模才逐漸明朗起來。事前，貝盧斯科尼還狂妄地說：罷工是「局部」的，不是全國性的。而事實上，罷工的巨大衝擊力使意大利一伙貪污腐敗的統治者大吃一驚。

1300萬的意大利工人都參加了歷時8小時的全國總罷工。工人們都放下自己手中的工具、筆桿子、駕駛盤和電子計算機等等。

全國各地有300萬人參加了抗議示威遊行和召開群眾大會。例如，快意汽車公司的一些全國性機構，100%的工人參加了罷工。在都靈，快意的老闆說祇有50%的人參加罷工，而實際上，工廠的停車場上是空蕩蕩的，生產已經停頓。

這次全國性的罷工，使整個意大利的生產乃至教育、運輸、通訊等基礎設施以及政府部門全部陷於癱瘓；其影響所及，不僅使意大利的老闆們驚呆了，而且國際上的老闆們也感受到它的巨大威力。因此，老闆們和他們的親密朋友英國首相貝理雅一起極力支持貝盧斯科尼反對意大利工人的鬥爭。但，老闆們的這種國際團結卻遇到了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的挑戰。在比利時、芬蘭、瑞士、西班牙、法國、德國、英國、澳大利亞、美國和加拿大等國的工會都在自己國內舉

行抗議示威活動，或者寫信表示同意意大利的罷工工人團結在一起。

在這次全國大罷工中，意大利的工會領導者，如意大利最主要的工會聯合會（CGIL）的領導人科弗拉梯（S. Catterati），他很少關心工人的權利，而更多關心他自己的社會利益和地位。在意大利，中間的反對派不僅害怕貝盧斯科尼和他的「改革」，更害怕工人階級的總罷工可能帶來的長時期的影響。所以他們都不願意進一步推動抗議示威運動向前發展，而祇希望通過同政府的談判來謀求妥協。這就充分表明，在當今意大利工人運動中，迫切需要開展反對工會官僚的鬥爭，使工人運動從工會官僚的控制中擺脫出來。

（蔚然摘譯自《工人力量》2002年5月號）

法國政局兩極化

杜瓦

法國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的結果，不啻是一場災難，這對人民群眾及傳統左派來說尤甚。據憲法規定，第一輪投票中得票最多的頭兩名候選人，才有資格進入第二輪競選。結果，能競逐總統的，便只有即將離任的總統、腐敗的右派希拉克，和極右派的法西斯主義、種族主義組織「國民陣線」的勒龐。上屆政府法國共產黨在任時盡失人心，在這一次大選裡，只得到3.7%的選票。反而另外的兩個遠左派組織、同屬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工人鬥爭」和「革命共產主義同盟」，得票拋離法共，前者有5.7%，後者有4.3%，開了歷史的紀錄。

在2002年4月21日舉行的第一輪總統大選，也開創了另一個歷史紀錄，自從法國實行總統直選，人民投下的棄權票也最高，達27.8%。

「工人鬥爭」和「革共盟」兩黨的得票共有10%，接近共產黨、綠黨和其他溫和左派全部得票的總和。「革共盟」自從1974年之後，這一次是首次推出本黨的候選人競選，而代表黨的是名不見經傳的27歲郵務工人、工會活躍份子。據一項調查顯示，接

票給他的人，是年齡在18-24歲之間的年青人，大多數是工人。而投票給「工人鬥爭」已有15年總統競選經驗的候選人者，多是35-49歲的白領和服務行業人士。在展開競選運動之前，「革共盟」曾經提議與「工人鬥爭」聯線競選，並以後者的候選人競逐總統，卻被拒絕這個提議。

第一輪投票結果出來後，引起全國震撼，因為人民突然發現，只能從一個腐敗的右派和更糟糕的法西斯極右派之間選出總統。從投票當夜開始，便爆發了全國各地的示威遊行和反對極右派上台的聯合陣線，而在次日，便有10萬人上街示威，而到了五一勞動節日，示威人眾更超過一百萬人，結果，就使希拉克冷手執個熱煎堆，在5月5日的第二輪投票壓倒性勝出。而誠如「革共盟」的聲明所示，投給希拉克的一票，是民眾反對極右派上台的結果。全國的社會活躍份子、工會和工人，也在磨拳擦掌，隨時準備用行動來回應希拉克推行的反社會、反勞工的政策。

（史丹輯寫自《國際觀點》2002年5月號）

巴塞羅那抗議示威親歷記

克羅夫特

3月16日下午六時，巴塞羅那有50萬人湧上街頭舉行抗議示威，「反對資本主義和戰爭的歐洲」。這次抗議示威遊行比去年在熱那亞的反資本主義抗議示威的規模要大得多。

川流不息的人群，青年人和老年人，學生和工會會員，匯集到巴塔羅亞廣場和附近的街區，似節日的慶祝，但也是政治的怒濤。每個人都咒罵英國首相布勒爾，意大利總理貝魯斯科尼和西班牙總理阿茲納爾。他們在歐盟首腦會議上結成了新自由主義和開放市場的聯盟。

這裡是自製的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旗幟和標語牌的海洋，反對佐治·布殊的戰爭競賽。上萬的工會會員跟隨在他們工會的旗幟後面行進。宏偉的群眾抗議示威使每個人都為之驚嘆不已。

300萬人口的巴塞羅那有六分之一的普通人民參加了遊行示威。站在陽台上觀看的人對遊行示威的隊伍拍手歡迎。一個婦女敲著平底鍋，同大家一起有節奏地高呼：與阿根廷人民團結在一起，反對銀行家和國際貨幣基金會。一群領取養老金的人站在人行道上，眼睛裡含著淚水，喊道：「反抗！反抗！」

簡·羅茲·卡西亞是一位24歲的巴士司機，他拿著自製的標語牌，上面寫著：「不要資本主義！」他說：「政治家們如托尼·布勒爾等在鐵絲網的保護下開會，要把一切都變成私有。他們要向工人大舉進攻，要為富有的企業家和大公司的利益控制一切。現在，人民的一致呼聲是：反對他們的強權和金錢的全球化；為社會和工人的權利保護自然資源。」

佩特里西亞·盧貝絲是一位運輸工人，她和丈夫、兩個孩子一起來參加示威遊行，她說：「我來到這裡把自己的心聲和大家匯合在一起，同歐洲的政治家們算賬，我感到很驕傲。巴塞羅那的人民聯合起來對資本主義腦滿腸肥的闊老說不。」

康蘇拉是個學生，他和一群朋友自製一面旗幟，上面寫著：「世界是誰的？是我們的！」她說：「我們在這裡抗議世界上一切錯誤的東西。」「自911恐

怖襲擊事件和美國發動對阿富汗戰爭以來，抗議示威運動是更加壯大了。」她的朋友安娜·瑪利娜補充說：「去年我去了熱那亞。他們殺死了一位抗議示威者。群眾非常憤怒。」「我感到很高興，抗議示威運動已發展到了巴塞羅那，這是我沒想到的。」

當權者和警察試圖嚇跑群眾，但結果恰好相反。

在前一天，警察便襲擊了和平抗議者。他們攔截了來自法國、意大利和其他地方上千上萬的群眾；他們要跨越邊界進入西班牙來參加抗議示威運動。

根據電視的測算，90%的巴塞羅那人民支持抗議示威運動。即使採取嚴厲的措施也阻擋不了群眾決心走上街頭。雖然群眾的抗議示威是和平的，而警察仍然要攻擊抗議的群眾。他們施放蒸汽，用橡皮彈射擊和使用催淚瓦斯驅趕群眾。但他們撲滅不了令人驚嘆的抵抗精神。

隔天，當地報紙的頭條新聞是：「勝利在街道上！」



工會會員參加鬥爭

斯托貝克

超過10萬的工會會員在巴塞羅那舉行反對歐盟首腦會議的抗議示威遊行。這是由歐洲工會聯盟組織的。幾百輛公共汽車，一列火車、一架飛機把人們從西班牙各地送到巴塞羅那來。約有2萬工會會員來自法國和意大利，少數來自其他國家。他們同聲反對資本主義。

鋼鐵工人費爾南多·羅比茲告訴《社會主義工人》報記者說：「政府對勞動和工作應當多作努力，而不應當為戰爭耗費金錢」。

醫務工人瑪麗亞·羅莎·溫努拉說：「有權勢的金融家和資本家集合到巴塞羅那來，是為了獲得更多的利益。我們的任務就是聯合歐洲所有的工人起來鬥

爭。他們要資本和金錢全球化。我們反對他們的全球化。」

從特爾弗爾市來的彼得羅·阿巴德說：「我非常憎恨以色列政府依靠戰爭和強權壓迫巴勒斯坦人民。歐盟各國政府應盡力阻止這類恐怖。」

由《社會主義工人》在西班牙的姐妹報《En Lucha》領導、由青年學生組成的精力充沛的小分隊跟隨在一面旗幟後面，上面寫著：「工人和學生聯合起來！」來自阿拉貢UGT工會聯盟的一群青年工人加入到這個小分隊來，其他工會會員唱起他們反對資本主義的歌曲，呼喊口號歡迎他們。

抗議示威遊行觀感

斯托貝克

在一個長時間裡，我們反對資本主義一直感到是一個弱小和不為人所知的少數。但，參加過3月16日巴塞羅那示威遊行的人，這種感覺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在一個保守政府統治的國家，竟然有50萬人起來反對資本主義的歐洲。這些來自巴塞羅那各個角落的人們，我每天在地下室、在玄學院的路上，在工作中，都遇見到。而我們卻不曾愉快地匯集在街上叫喊著，唱著歌，跳起舞來。

幾千個加入到歡快人群中的移民高呼：「沒有人是非法的！」。而其他更多的抗議者合著節拍高呼：「打倒資本主義！」

巴塞羅那中央區變成了無窮無盡的奔騰不息的人群、旗幟、模擬像、彩車和橫幅的河流。抗議者朗頌的一首詩的結尾是：「我們是千千萬萬，這個星球不是你的！」

強有力的示威遊行是幾個月來積極份子積極準備和工作的結果。

我們的統治者用噴氣式戰鬥機和數千防暴警察，對抗議示威的群眾施行恐怖。

千百萬群眾都期盼示威運動要有新的開展。對此，我們運動的積極份子應負起責任來。

大多數人都意識到我們的和平抗議運動面臨著不容忽視的危險，經過多次的討論，認識到必須把抗議運動推進到新的領域去。

我們一些人相信，關鍵的領域是工廠。必需把敵人在工廠的權力奪過來。

鐵路工人在召開高級會議之日舉行罷工，表明了工人是我們鬥爭的一部份。我們現在一定要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在工人和反對資本主義運動之間建立起堅固的聯繫。我們相信，當工廠響應街道上的鬥爭、我們就可能獲得勝利。

（以上3文由蔚然摘譯自3月29日《社會主義工人報》）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

(六)

曼德爾著 兆立譯

第四章

托洛茨基的 可供選擇的經濟戰略

1926-27年的聯合反對派的經濟建議

1926-27年的聯合反對派主要地是左派反對派與（〔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所支持的）圍繞著齊諾維也夫和加米尼夫的團體結合的集團。其他反對派的團體、如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對派的成員也參加了這個集團。在經濟政策的問題上，聯合反對派採取了左派反對派的1926-27年的大多數判斷審慎的分析和實際的建議。

聯合反對派尖銳地批評國有部門積累率的低下（在工業方面比沙皇時代的某些時候還要低）。它認為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增長率（每年百分之四至九）太低了。它建議，工業化進度的增加和國有部門的較大投資應該由以下兩個泉源來投資資金：向人口中較富部門徵累進稅和極力減少非生產性的費用，特別是在國家行政部門。

鑒於1980年代的反酗酒運動，今天的人會感到一些興趣的是，聯合反對派早就發起運動，反對因伏特加酒的國家專賣、公開提倡所造成的可怕後果。它所用的論點預先說出了戈爾巴喬夫領導層在五十多年以後所用的論點：

伏特加酒由國家銷售，原先是作為一個實驗而引進的，而且附有條件，使所得的收入的主要部份用作工業化，特別是用來發展金屬工業。事實上，由國家來銷酒只會禍害工業。這個實驗應該視為完全失敗。由國家來銷售伏特加酒，不但已經對私人經濟有負面影響，因為這在沙皇時代已是如此，而且主要是對國家部門有負面影響。〈14〉

曠工的增加、劣質的工作和浪費、對機器的損害、意外事故的增加、火災、打架等等，每年都要浪費掉數以億計的盧布。……廢止伏特加酒的國家銷售會自然而然地為工業化改善物質、文化的資源。〈15〉

1926-27年的聯合反對派所建議的經濟政策，既沒有包括對貨幣——價格關係或市場機制的擯棄，又沒有包括向“軍事共產主義”或“指令經濟”的過渡。恰恰相反，像1923年的左派反對派的政策一樣，為了工人們的利益，為了更快速的、但決不是強制的工業化的利益，它是建基在使用這些機制上：

不去有系統地、有決心地降低生產成本和工業產品的批發、零售價格，工業化的必要的加速是不可能的，不去適應世界市場的價格，它也是不可能的。這是發展我們的技術的基礎結構、更好地回應工人群眾需要的唯一方法。〈16〉

在新經濟政策之下，敵對勢力、富農、「耐普」人和官僚們的某種生長是不可避免的。這些力量不能簡單地用行政命令或經濟壓力來消滅之。在創立、實現新經濟政策時，我們也在我們的國家中替資本主義關係創造了空間，而且在今後的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之內，我們應該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們可以用一個正確、考慮週到和有系統的工人階級政策，依靠小農和與中農聯盟，來與他們抗爭，來戰勝他們。〈17〉

聯合反對派政綱的中心目標，是保衛蘇聯工人階級的利益。讀過這個政綱的人都會知道，相反的說法，一個到今天還有人作出的說法，只不過是誹謗而已。這個政綱詳細地列出了保衛工人階級利益的要求：反對失業、反對實際工資的任何減少，主張立刻改善工人們的居住條件，反對官僚地誤用合理化運動，主張工人真正地管制工資和工作規範，主張工會真正地獨立於工廠領導層，主張保證工人有罷工權利。反對派要求決定性地增加工人參與經濟的領導

層。〈18〉這個政綱在以下的聲明中，達到了高潮：

判斷我們的國家在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的進展的決定性因素，除了生產力的增長和社會主義成份優勝於資本主義成份之外，必須是工人階級生活條件的決定性的改進。〈19〉

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派從1929年到1933年的冒險主義路線的鬥爭

當斯大林推行他向強制的鄉村集團化和超高速的、不成比例的、浪費的工業化轉變的時候，托洛茨基和大多數反對派人士都覺得非常不對。他們的看法是，這個冒險主義的路線會嚴重地損害工人階級的利益。我們可以從《反對派公報》上引用許多文章。最重要的文件有托洛茨基1932年的文章《處於危險中的蘇聯經濟》和賴可夫斯基在1929年至1931年之間發表的幾篇文章。賴可夫斯基在他的《1930年的宣言》中寫道：

完全集體化這個口號本身是最大的經濟胡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知道新的財產形式只有在新的財產關係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起來。但是這些新的生產關係還沒有存在。……廢除新經濟政策和廢除富農為一個階級的政令是另一個經濟愚行。……沒有一個憲章或法令能夠廢除仍然在經濟、日常生活中起作用的、仍然圍困著集體農場並且已經在其中運轉的矛盾。忽視這個經濟真理的嘗試已經導致有系統地使用暴力。……密集的集體化是在違反黨的綱領、違反最基本的馬克思主義原則、蔑視列寧對集體化、中農和新經濟政策的最基本的警告的情況下發動的。……市場上食物產品數量的減少、物價的快速增加，引致實際工資的降低。……關於紀律的政令直接違反了1921年黨大會關於工會的決議案。……〔伴隨著這個政令的是〕社會主義競賽的引進（所用的方法與在鄉村中用來引進密集的集體化的方法相似）、工資率的減少、工作規範的增加……和工人階級的法律地位和物質條件的惡化。〈20〉

托洛茨基後來對於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過渡時期的經濟政策這個基本問題，在他的《處於危險中的蘇聯經濟》一文中寫道：

如果一個萬能的頭腦，那種設想它自己處於〔法國十八、十九世紀天文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拉普拉斯的科學想像力的頭腦——一個能夠同時記錄自然和社會的所有過程、測量它們的運動的動力、預報

它們的交互作用的結果的頭腦——存在的話，這樣一個頭腦當然能夠用推理制訂一套沒有錯誤的、詳盡無遺的經濟計劃，從麥田的數目開始一直到一件背心的最後一個鈕扣。官僚層常常以為它就是有了這麼一個頭腦；那就是為什麼它這麼容易地擺脫了市場和蘇維埃民主的控制。但是，事實上，官僚層在對它的精神資源的估計上犯了極大的錯誤。……

無數的活生生的經濟參與者，國家的私人的，集體的和個別的，不但必須通過計劃委員會的統計決定，而且必須利用供應和需求的直接壓力，來宣稱他們的需要和他們的相對力量。計劃是通過市場來核對的，而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通過市場來實現的。市場本身的調節必須依靠由它的機制所激起的趨向。各個部門所提出的藍圖必須通過商業計算來證明它們的經濟效力。不對盧布加以管制，過渡經濟的制度是不可想像的。這個做法的先決條件是，盧布要與票面價值相等。沒有一個穩定的貨幣單位，商業會計只會越來越混亂。……

只有通過國家計劃、市場和蘇維埃民主這三個要素的交互作用，過渡時期的經濟才能走向正確的方向。這樣做並不能保證在幾年之內完全克服矛盾和不成比例（這是烏托邦！），但是只有這樣做才能保證它們（矛盾）的減少，而且通過這種減少才能保證無產階級專政的物質基礎得以加強，直至新的、系統的革命擴闊社會主義計劃的活動場所和重建這個制度。

〈21〉

他在以下的文字中寫得更清楚：

無產階級實行的經濟基礎只有從這樣的時刻開始才能算是完全得到保證，那就是，當國家不會被迫憑藉強制性的行政手段向大多數農民徵收鄉村產品的時候，那就是當農民們自願地以必需份量的糧食和原料來供應國家以換取機械、工具和個人消費品的時候。只有在這個基礎上一連同其他必要的國內、國際條件——集體化才能獲得真正的社會主義性質。〈22〉

一年以後，托洛茨基在他的《蘇聯的計劃經濟：成功或是失敗》（1933年9月7日）一文中更有系統地重覆這個論點。〈23〉還有兩個問題為托洛茨基所特別留意的：盧布的穩定和蘇聯經濟的自給自足的問題。前一個問題，他認為，只有如果盧布建立在金本位上才能夠達到。後一個問題他是反對的。這兩個問題明顯地是互相關連的，這就是為什麼托洛茨基如此地注重對外貿易的壟斷。與世界市場的聯繫是一回

事；受世界市場的控制則是另外一件完全不同的事。

聯合反對派的某些領導人和以後的左派反對派的某些領導人（普列奧勃拉仁斯基、皮亞塔科夫、拉狄克和斯米爾加）有著一個不同的觀點。他們投降了斯大林，因為他們認為他的冒險主義的政策基本上代表對蘇聯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力量的一個決定性的打擊。〈24〉對這個立場的辯護，邏輯地意味著他們不得不要與反對派決裂，一個投降，它的全部理論及經濟的前提遭到了托洛茨基和反對派的其他領導人的譴責。

托洛茨基和反對派的其他領導人認為官僚主義地作出計劃的經濟、強制性的農業集體化和冒險主義的工業化速度和巨大的不成比例（規劃），代表了第三種發展趨勢。這種發展趨勢既不符合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又不符合工人和小農的利益，只符合正在蘇聯社會中鞏固成爲一個特殊階層（caste）的官僚層的利益。因此，這個政策並不表示“用野蠻手段實現反對派的綱領”。

托洛茨基在1934-40年時期的經濟政策

我們實在不需要詳細地看看托洛茨基在1934年至1940年之間的經濟建議。基本上說來，這些建議是在1932年至1934年之間所主張的政策之延續。

《被背叛的革命》的最後一章中關於經濟政策的那幾段，今天讀起來，很像期待看眾多的蘇聯經濟學家和公眾人物自從戈爾巴喬夫推行開放政策（Glasnost）以來在最近幾年中一直在說的話：

然而，官僚層的權力及其獨立性之增長，並不是沒有限制。歷史的因素強過於那些元帥，甚至強過共產黨總書記。沒有精密的計算，經濟的合理化是談不到的。計算，與官僚們的任性行爲是不能相容的。恢復穩固的盧布，即一種不依賴於“領袖們”的盧布，這個需要是由底下的事實向官僚們提出來，即是：他們的專橫的統治是一天比一天更厲害的與國家生產力發展相衝突了，——恰像當初君主專制政體與資產階級市場發展不能調和一樣。社會各階層份子爲爭取全國收入分配之鬥爭，有了貨幣計算之後，一定要現出更明顯的性質。工資數額問題，在食物券制度之下，差不多是無足輕重的，現在對於工人們則是沒有決定意義的問題了。隨此問題而起的，還有工會問題。由上頭委派工會辦事人制度，註定要遭遇一天比一天強

大的反抗。不僅如此，在計件工資制下，工廠經營是否完善，也是與工人有直接利害關係的。斯塔罕諾夫份子愈鬧愈兇的指責生產組織上之錯誤。官僚們任用私人充當經理、工程師等的習慣，愈來愈令人難於忍受了。協作社和國營商店，比前更加要依賴於購買者。集體農場和個別農戶，現在懂得將他們對國家的交易以數字表示出來。他們漸漸不能容忍上頭委派他們領袖的辦法，這些領袖，除了與當地官僚關係密切之外，往往別無所能。最後，盧布又能投射光明於最神秘的境界，即是官僚們的合法的和非法的收入方面。如此，在一個政治上受扼勒國家裡面，貨幣流通成爲一種重要的槓杆來發動反對的勢力了，而且預告所謂“開明”專制之結局即將開始了。

工業之增長和農業之歸入國家計劃，使得領袖們的職務十分繁難起來，而且提出了品質問題；正在此時，官僚主義反而摧殘了創意力和責任感，無此二者即沒有、而且不能有什麼品質進步可言的。官僚主義的毒瘡在大工業方面也許不十分明顯，但輕工業、食品工業、集體農場、地方小工業，連著協作社，總而言之，即最與人民相接近的那些經濟部門，都染遍這種毒瘡了。

蘇維埃官僚份子的進步作用，祇在這個時期內，此時人們將資本主義技術最重要之原素輸入於蘇聯。借用、模仿、移植和接種的初步工作，是在革命所安下的基礎上完成的。如此，在此時期是談不到技術科學或藝術方面有什麼新發明的。由官僚下個命令，固然可以依照西方模型建立大規模的工廠，——雖然要比人家多付三倍的費用。但是你走得愈遠，則經濟愈加進入於品質的問題，而此問題是同影子一般，不是官僚們所能操縱的。蘇維埃的生產品，好像烙上了粗製濫造的印章。在國有化的經濟之下，要提高品質，就要求生產者和消費者中間有一種民主主義，要求批評和創意之自由，——而這些條件卻與畏懼、說謊和諂諛的極權政制不能相容的。

品質問題背後，還有一個更複雜更巨大的問題，此問題可以包括在技術文化獨立創造的觀念之內。古代哲學家說，鬥爭是萬物之父。若是思想不能自由衝突，便創造不出新價值來。固然，革命的專政，其真正本質是嚴厲限制自由。但正因為這個道理，所以革命時代永不會直接助長文化的創造；祇是做些清除道路的工作而已。無產階級專政若是愈加停止其爲專政，則其貢獻於人類天才活動範圍也愈廣大。社會主

義文化之繁榮一定是與國家之消亡成正比例的。在那簡單的和不可動搖的歷史法則中，已經包含有蘇聯現行政制之死刑判決書了。蘇維埃民主制並非抽象的政治要求，更不是抽象的道德，卻已成為蘇聯的生死需要之問題了。〈25〉

無疑地，托洛茨基對“反對力量動員”的節拍預示得並不準確。他低估了恐怖行動的非政治化的影響、工人階級的恐懼和微粒化。但是，在這段剛剛引過的文句中，長期的發展傾向卻被精確地、預言式地描述了。六十年之後，這個分析需要增添的地方的確很少。它讀起來就是對蘇聯的制度性危機的描寫。這個危機今天是人人皆知了。

(未完待續)

第四章註釋：

- <14> 從《聯合反對派的政綱》上來的這裡引的都來自 Ulf Wolter 所編的五大卷的德文版反對派文件集《蘇聯的左派反對派1923-1928年》柏林1976年。這一引句來自第五卷，第345、385頁。
- <15> 出處同上，第586-587頁。
- <16> 出處同上，第474頁。
- <17> 出處同上，第336-337頁。
- <18> 出處同上，第349-359頁。
- <19> 出處同上，第344-345
- <20> 見賴可夫斯基 (Christian rakovsky) 的《蘇聯反對派文選1923-1930年》，倫敦1980年，第167-8頁。
- <21> 《處於危險中的蘇聯經濟》(1932年10月22日)，在《托洛茨基文集1932年》，紐約1973年，第273-5頁。
- <22> 出處同上，第271頁。
- <23> 《蘇聯的計劃經濟：成功或是失敗》(1933年9月7日)，在《托洛茨基文集補篇1929-1933年》，紐約1977年，第292-3、296-7頁。
- <24> 伊薩克·多依徹把蘇聯從1928年到1932年的社會、經濟改變描述為“第三次革命”。
- <25> 《被背叛的革命》，紐約1972年，第294-6頁。
〔中譯文錄自何偉譯的該書，春燕出版社印行，第238-40頁。〕

《十月評論》代售下列書籍

第四國際簡史	法蘭克著	14元
古巴革命戰爭的回憶	格瓦拉著	20元
匈牙利悲劇	弗萊雅著	8元
1968年法國革命	南燦譯	18元
鄭超麟回憶錄	鄭超麟著	20元
雙山回憶錄	王凡西著	20元
我的回憶	陳碧蘭著	30元
記尹寬	鄭超麟著	40元
馬克思主義與第四國際	曼德爾著	30元
第四國際文獻 (第一卷)	兆立譯	40元
第四國際文獻 (第二卷)	兆立譯	40元
第四國際文獻 (第三卷)	兆立譯	40元
先知三部曲(托洛茨基傳)3卷集	多伊徹著	100元
從蘇聯歸來	紀德著	12元
史事與回憶(3卷集)	鄭超麟著	200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 (第一卷)	劉家良等著	30元
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研究 (第二卷)	曼德爾等著	30元
香港的前途與社會主義運動	新苗	10元
論基本法與政制改革	新苗	10元
香港人的出路：爭取民主收回主權	新苗	10元
八九民運的回顧與前瞻	新苗	10元
從官僚社會主義到官僚資本主義	向青、劉宇凡著	70元
論中國官僚社會主義	向青著	40元
台灣人民怎樣選擇	新苗	20元
新婦女論	柯俞泰著	54元
苦口詩詞草	謝山著	30元
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	曼德爾著	8元
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諸問題	曼德爾著	30元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導論	曼德爾著	8元
過渡時期的經濟	曼德爾著	8元
過渡時期的社會和經濟	曼德爾著	20元
關於過渡社會的理論	曼德爾著	10元
晚期資本主義	曼德爾著	45元
從斯大林主義到歐洲共產主義	曼德爾著	24元
托洛茨基文集	托洛茨基著	40元
斯大林評傳	托洛茨基著	30元
托洛茨基自傳	托洛茨基著	25元
被背叛的革命	托洛茨基著	40元
過渡綱領	托洛茨基著	9元
論蘇聯的國家性質	托洛茨基著	22元
蘇聯的歷史大冤獄	托洛茨基著	5元
文學與革命	托洛茨基著	25元
十月教訓	托洛茨基著	10元
他們的道德與我們的道德	托洛茨基著	5元
論學生與知識份子	托洛茨基著	3元
熱月反動	托洛茨基著	3元
斯路向	托洛茨基著	5元
流亡日記三種	托洛茨基著	5元
戰爭與第四國際	托洛茨基著	5元

Unemployment aggravating in China

Zhang Kai

Since China embarked on the road for capitalism, enterprises with profit-making as their main concern have been laying off workers for cost-effectiveness. With China entering into global competition after accession to WTO, readjustments, bankruptcies and mergings of enterprises will accelerate; the post Sept 11 impact on China's exports also added to the severity of the problems.

Faced with such critical situation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been compelled to announce that the number of unemployed workers is increasing. However, the figures that were announced were quite discrepant.

On the one hand, Zeng Peiyan, the Director of the 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 reported in early March 2002 to a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meeting that the registered unemployment rate for cities and towns was around 3.6%, the total number of unemployed and stepped-down workers from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was around 12 million (with the former being around 6.85 million, and the latter around 5.15 million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 of the authorities, by the end of 2002, the total for the above two categories would amount to around 14 million. Of this figure, registered unemployment rate for cities and towns would rise to around 4.5%. An estimated 2 million people would join the ranks of the unemployed in the year 2002 alone.¹

On the other hand, "China's labour and social security situation"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White Paper) issued by the News Bureau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April 29 this year said, "from 1998 to 2001, the aggregate number of stepped down workers from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totaled 25.5 million, and of which 16.8 million managed to have rearranged employment." This would mean that 8.7 million are still in the "stepped down" condition. This is discrepant with the 5.15 million figure that Zeng Peiyan reported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wo months ago.

Wang Dongjin, Deputy Chief of the Labour and Social Security Department, when the above White Paper was announced, openly acknowledged that China was facing a severe condition of employment, and the number that newly joined the labour force was at an unpredicted peak. In the coming few years, 12 to 13 million will enter the labour market per year. Even if China retains its current 7% economic growth per year, only 8 million jobs will be created. This means the annual newly added unemployed will be 4 to 5 million. By the end of 2005, a 20 million new unemployed force will appear.

The Green Paper "Report on China's Population and Labour Problems" recently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ointed out the impact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on China's employment situation: in the short term, urban unemployment will increase by 3 to 4 million,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will rise by 2%. The impact on agriculture will be most severe, and it is estimated that employment will decrease by 10 million,² though many reports predicted that in the long run, accession to WTO will create 2 to 3 million jobs.

Official figures indicate that registered urban unemployment has

risen from 3%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to 3.7% at the end of March. According to the Population Study Institute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actual urban unemployment rate would be between 5% and 6%.³ Quite a number of scholars estimated it was as high as 20%.

With the situation deteriorating,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realize that something must be done to resolve the livelihood difficulties of the stepped down or unemployed workers, or else there would be massive unrest such as the strikes and protests that happened in March this year. The Labour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under the Labour and Social Security Department published a paper entitled "Flexible employment: an important path to resolve re-employment".⁴ It proposed various categories of "flexible employment", such as micro enterprises, family workshops, temporary, casual, odd or seasonal jobs, contract labour, hourly work, part-time employment, sales, or self employment. However, after listing all sorts of possibilities, the paper went on to detail the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which include the following:

1. Micro enterprises or the self-employed find it very hard to get loans, tax concessions, or information support;
2. the existing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s very discrepant with the requirements for promoting flexible employment, and workers are generally without social insurance;
3. the rights of workers under flexible employment schemes are not protected, for example their wages are below the legally defined minimum wages, delay in payment of wages, overtime work and lack of safety are serious, and dismissal by employers is random.

Officially the White Paper attempts to shirk the 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y and says that "the government implements the employment policy of 'labourer-autonomous employment, market-adjusted employment, and government-facilitated employment', encourages labourers to find jobs through fair competition, supports the management to have autonomy o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heir employees, and takes various measures to promote market-oriented labour system." Surely, such a policy does not favour the employees.

Currently, stepped down workers from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are entitled to a basic livelihood allowance (which is lower than the minimum wages) for three years, and if they have not found new employment, will be entitled to two more years of a lower allowance. If they still have not found a job, they will receive the same treatment as the urban poor, and take a very low allowance from the government.

With large sections of the working class being condemned to unemployment, and their housing, medicine and pension schemes being removed by the market reform, there are more protests of workers in defense of their rights. The worsen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are spurring a deeper crisis in the ru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5 June 2002

¹ *Wen Hui Pao*, 5 March 2002.

² *Sing Tao Daily*, 24 May 2002.

³ *Sing Tao Daily*, 5 June 2002.

⁴ *People's Daily*, 23 May 2002.

OCTOBER REVIEW VOL.29 ISSUE 2 2002.6.30

HONG KONG

- 2 Five faultful years of SAR Administration.....Zhen Yan
4 To whom are the new high officials responsible?..... Wei Bo

SPECIAL ON JUNE 4 ANNIVERSARY

- 5 June 4 13th Anniversary greeted by toilers struggles.....*Editorial*
6 Open letter to Peoples' Congress (*reprint*) 114 victim relatives
7 Open appeal..... (*reprint*) Over 200 persons
8 In memory of June 4..... (*reprint*) People from 5 provinces
10 In memory of 3 killed students (*reprint*) Ting Zi Lin
13 A bright spot in a grey mass (*reprint*) Ting Zi Lin

CHINA

- 15 Unemployment aggravating in China.....Zhang Kai
17 A report on workers struggles in Da Qing.....Chen Tai
21 Open letter..... (*reprint*) Liaoyang alloy factory workers
23 Letter to Province Minister (*reprint*) Liaoyang alloy factory workers
25 Statement (*reprint*) International labour solidarity group

INTERNATIONAL

- 26 Palestine and the Middle East..... V.Stead
27 Palestinians fight S.Ashave
29 Behind Israel's offensive T.Honig-Parnass
32 Second APEC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Conference..... Zhong Ming
34 Italy: Millions rally against Berlusconi..... F.Dangeli
Italy's bosses reeling from general strike P.Ross
35 France: A political earthquake..... F.Duval
36 Spain: big anti-capitalist protests H.Croft
37 Trade unionists join struggle, view from street..... L.Stobart

SPECIAL ARTICLE

- 38 Trotsky as alternative (6)..... E.Mandel

ARTICLE IN ENGLISH

- 42 Unemployment aggravating in China..... Zhang Kai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29卷 第2期 (總第209期)

2002年6月30日出版

出版人：十月書屋

編輯：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督印人：陳昌

地址：九龍觀塘敬業街65號敬運工業大廈14樓N座

電話：9846 3428

傳真：2346 5268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電郵地址：OctoberReview@HongKong.com

Address：G.P.O.BOX 10144, HONG KONG

Tel.No.：(852) 9846 3428 Fax：(852)2346 5268

E-mail Address：OctoberReview@HongKong.com

【十月評論內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承印：藍馬柯式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柴灣新業街5號

王子工業大廈12樓

電話：2597 6800

定閱：(本地) 每年港幣八十元

(外地) 平郵：每年US\$15

空郵：亞洲US\$18

其他US\$22

Subscription Rates:

Hong Kong: HKD\$80 per year

Overseas Surface Mail: US\$15 per year

Air Mail (Asia): US\$18 per year

Air Mail (Others): US\$22 per year

目錄

香港	2	香港回歸五年 政府錯失頻生	振言
	4	高官問責制為誰設?	微波
「六四」 十三週年 特輯	5	工農以鬥爭迎接「六四」十三週年	社論
	6	致人大、政協的公開信	(轉載) 114位難屬
	7	呼籲民主法治、社會公正，釋放政治犯 (轉載) 中國200多名民運人士	
	8	紀念"六·四"，理性前進. (轉載) 中國大陸五省市人權民運界人士	
	10	紀念三位遇難的大學生	(轉載) 丁子霖
	13	茫茫人世中的一點亮色	(轉載) 丁子霖
中國	15	失業與再就業形勢嚴重	張開
	17	大慶工潮綜述	陳泰
	21	遼陽鐵合金廠職工公開信	(轉載)
	23	遼鐵破產職工致遼寧省長薄熙來的公開信	(轉載)
	25	國際工會代表團聲援遼陽工人	(轉載)
國際	26	中東危機剖析	斯蒂德
	27	中東的怒濤	亞沙夫
	29	以色列境內的計時炸彈——巴裔公民	康涅—帕納斯
	32	為第三世界的和平、全球正義和團結而奮鬥	仲明
	34	義大利3百萬人上街	丹熱尼
		全國總罷工震顫了意大利老闆們	路西
	35	法國政局兩極化	杜瓦
	36	巴塞羅那抗議示威親歷記	克羅夫特
	37	工會會員參加鬥爭	斯托貝克
		抗議示威遊行觀感	斯托貝克
特譯	38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 (六)	曼德爾
英譯	42	Unemployment aggravating in China	Zhang Kai